

# 元成宗繼位問題探析\*

許正弘\*\*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 摘 要

蒙元皇位繼承的紛爭不休，可說是其衰亡的重要因素，因而成為後世學者關注的重點，研究成果豐碩。元成宗 (r. 1294-1307) 是忽必烈 (r. 1260-1294) 更改國號後的首位繼立新帝，也是真金 (1243-1286) 後人掌控皇帝寶座的濫觴，重要性不言可喻。本文探究成宗繼位問題，重新審視與辨析他在繼位前若干具有指標性的政治事件，包括：真金接班的風波、真金子嗣入承大位的確立、成宗即位優勢的形成及其登基的經過，等等。本文指出在這些事件所見世祖朝各方政治力量的升降與重組，特別重視真金遺孀闊闕真 (?-1300) 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作用，並據以回應或補充前人重要成說。

**關鍵詞：**元朝，皇位繼承，元成宗，鐵穆耳，闊闕真，甘麻刺

---

\* 本文係據筆者博士論文第一章刪補而成。投稿《清華學報》期間，惠承編委會嚴謹專業的編審作業，並得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賜正，減少拙作誤漏，強化論述方向，銘感之至。唯文中有任何問題，仍由筆者自負。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電子郵件信箱：s9843805@m98.nthu.edu.tw

## 一、前言

領導權力的更替及傳承，是古今中外每個政權都要面臨的重要課題。過往，漢人王朝統治者，從秦始皇 (r. 221 B.C.-210 B.C.) 起，稱為皇帝，主要採用嫡長子世襲制，係屬統一國家的特質；胡族王朝領導人則稱作單于或可汗，一般採取推選的方式，<sup>1</sup> 具有支配權力多元性的色彩。<sup>2</sup> 而游牧民族建立的國家，在入主中國的局部或全部後，致使兩種不同繼嗣制度有所交會、變化以至於衝突，構成它們在中國史上獨特與延續兼備的特色。

蒙元滅金 (1234) 亡宋 (1279)，首建統轄中國全域的游牧民族帝國，誠屬中國史上一大變局。<sup>3</sup> 統一後的幅員空前遼闊，卻因前述兩種繼嗣體制的矛盾無解，致使皇位繼承的紛爭不休，政權擾攘難安，成為其不足百年即亡的重要因素。<sup>4</sup> 世祖朝 (1260-1294) 以降，對外擴張征伐漸息，內部統治階層圍繞嗣君問題的政爭卻更熾烈，不到四十年 (1294-1333) 竟已更換十位皇帝，尤其引起後世學者關注。

關於元朝的皇位繼承，前賢論述已詳，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與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兩篇論文可為代表。<sup>5</sup> 二文先後系統考察

<sup>1</sup> 推選的方式依游牧民族經濟形態及其部族組織，又可分成三類：臨事推舉，事畢解除的西藏型；首領逝世後重新選舉有才能者，不以前任首領子孫為當然繼承人的蒙古型；由固定領袖家族男子出任的突厥型。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65), pp. 114-118.

<sup>2</sup> 漢、胡兩種不同繼承制度及其演變的綜述，見李明仁，〈中國古代君主繼承制之研究〉（新北：稻鄉出版社，2012），頁 1-16。

<sup>3</sup> 元朝統一中國的性質、規模及其政權性格，概見蕭啟慶，〈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1999），〈元朝的統一與統合：以漢地、江南為中心〉，頁 16-24。另，魏復古 (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 揭櫫的「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 理論引起廣泛關注與爭論，特別是在日本學界，而元朝常被視為征服王朝的典型之一。魏復古等著，鄭欽仁、李明仁編譯，〈征服王朝論文集〉（新北：稻鄉出版社，1999）。本文無意涉入征服王朝理論的爭議，逕稱元朝為游牧民族帝國者，僅為行文方便，尚請注意。

<sup>4</sup> 所謂亡國，概指元順帝退出中原北返之年，亦即 1368 年。上距 1279 年消滅南宋而混一南北，前後不過九十年，不足百年。元朝衰亡諸因素的討論，略見王靖華，〈元代興亡原因的探討〉（臺北：名山出版社，1985）；張瑞成，〈元朝衰亡文化因素之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2012）。

<sup>5</sup> 蕭功秦文後改題為〈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兩種政治傳統重疊的歷史後果〉，收入蕭功秦，〈蕭功秦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頁 386-416；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收入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蒙元時期各方勢力競逐皇位的歷程，都指出：蒙古選汗舊制的保留，可說是造成紛擾不止的關鍵。而各方勢力並非完全固守蒙古舊制，更多是在標舉舊制的旗幟之下，視情況引進世祖朝建立的中國儲君傳統，達到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二文論點恢弘，即便發表距今已逾三十年，仍具參考價值，但在個別皇位傳承的問題上，顯然有俟後來者更作精深的研究。

蒙元前後十五帝，在多次的皇位傳承中，成宗鐵穆耳 (Temür, r. 1294-1307) 的繼位，係世祖更改國號為大元 (1271) 後的第一次更立新帝，也是真金 (Jingim, 1243-1286, 追上廟號裕宗) 後人掌控皇帝寶座的濫觴。這是元代政治演進與權力過渡的重大環節及議題，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學界，包括上揭蕭、周二氏論文在內，但凡元代政治史的通論及專著，或詳或略，莫不有所涉論。此中，李則芬 (1909-2004) 所撰〈元成宗嗣位的大秘密〉一文，可說是較早也較為全面疏理種種疑點的專題論文，值得注意。其文要旨在於：成宗得以繼立，主要原因是大臣反對南必 (Nambui) 皇后攝政。<sup>6</sup> 該文發表迄今將近五十年，卻仍不失為一家之言。<sup>7</sup> 然而，重新審視成宗繼位前若干關鍵年分的政治事件，例如至元二十二年 (1285) 的真金接班風波，至元二十八年由真金子嗣入承大位的確立，至元三十年鐵穆耳即位優勢的形成，以及隔年即位的經過，特別是真金遺孀闊闥真 (Kökejin, ?-1300) 在其間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影響，存有不少仍待廓清和再作申論的餘地。筆者不揣淺陋，廣事稽核相關史料，試圖檢討既有成說，考辨可能疑義，嘗試提出一得之見，冀以就教於方家。

## 二、至元二十二年：真金接班的政治風波

元世祖次子真金的接班之路原本日趨穩當。中統三年 (1262) 十二月，他受封燕王，守中書令。五個月後，兼判樞密院事。守中書令與兼判樞密院事二職雖是虛銜，「唯默避任」，但多少已能參預軍政大事。至元二年，奉詔出居潮河（發源於

---

頁 31-46。

<sup>6</sup> 此文原載《東方雜誌》復刊第 5 卷第 11 期，增修後收入氏著《元史新講》，作為專章之一節，改題〈成宗鐵穆耳嗣位的秘密〉。李則芬，《元史新講》第 3 冊（臺北：黎明文化，1989），頁 240-255。

<sup>7</sup> 劉曉在其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元史研究概況的專書中，論列成宗朝政治相關論著凡二文，其一即為李則芬文，可知其重要性與代表性。劉曉，《元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73。

河北豐寧草碾溝南山），不久召還。七年，奉命巡撫稱海（Činqai，治今蒙古科布多省東部宗海爾罕山北），<sup>8</sup> 至冬還京。十年，受冊皇太子，設立宮師府，在東宮逐漸形成自己的怯薛（kešig，蒙語「番衛」之意）班子暨僚屬集團。這批文武官員基本上擁護漢法，而以自幼濡染儒學的真金為首，形成新的漢法派力量。十六年十月，真金受詔參決朝政，凡事先啟後聞。二十年初，設立詹事院，成為他與其臣僚的議政場所，威望日高，傳繼大位似乎指日可待。<sup>9</sup>

真金接班的態勢日益高漲，當時已廣為人知，只是內廷事秘而難得其詳，外人不免捕風捉影，各作「解讀」。從波斯文官方文獻到漢文私家著述都有相應記載，足證當時傳聞流布的廣泛。<sup>10</sup> 然而，真金從政之路並非全然坦途，路上險阻亦復重重。他的政敵或競爭者主要有三：理財大臣、南必皇后與同母胞弟，各自明爭暗鬥，聲勢洶洶。茲分述如下。

其一是忽必烈先後任用的兩位理財大臣——阿合馬（Ahmad, ?-1282）與盧世榮（?-1285）。雙方陣營的長期對抗，真金太子似乎都佔上風，兩位大臣陸續遭到誅殺。然而，至元二十二年年年初，阿合馬餘黨揭露南臺御史奏請忽必烈禪位封章，引起風波，竟使真金在年底驚懼致死。真金死後，漢法推行失去主要支持者，顯得難乎其繼，<sup>11</sup> 更是深深影響元代政權的未來走向。<sup>12</sup>

其二是忽必烈續娶的南必皇后。至元十八年二月，真金母后察必（Čabi, ?-1281）

<sup>8</sup> 稱海城所在，見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元稱海城考〉，頁 55-60。

<sup>9</sup> 上述悉據黃時鑒，《大漠孤煙·蒙古史 元史》，《黃時鑒文集》第 1 冊（上海：中西書局，2011），〈真金與元初政治〉，頁 48-62。恕不一一引注。

<sup>10</sup> 波斯文史書《瓦薩甫史》提到忽必烈欲使真金參決朝政，並與諸臣約定，「在可汗死後奉真金即帝位」。《史集》則記忽必烈「命令立真金為合罕」，並「立了真金為帝」，而真金「在位三年」後去世。漢文私家著述中，南宋遺民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敘》的記載，與《瓦薩甫史》與《史集》的說法不謀而合。然其說不盡正確，且闕乏其他漢文文獻的佐證，屬於獨家紀錄。多桑（Constantin d'Ohsson）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 307；拉施特（Rashid al-Din Tabib）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 2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頁 352；鄭思肖著，陳福康校點，《鄭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心史·大義略敘》，頁 179。按：《心史》的真偽存在爭議，但有學者考察書中的〈大義略敘〉，拈出所記若干細節，不少未見於其他漢籍，「可以確定為一篇史料價值很高的元代文獻」。鍾煥，〈《心史·大義略敘》成書時代新考〉，《中國史研究》，1（北京：2007），頁 133-149。這是重要與正確的觀察，而《心史》此處記述的獨特性，可為其說再添一個例證。

<sup>11</sup> 黃時鑒，《大漠孤煙·蒙古史 元史》，〈真金與元初政治〉，頁 48-62；丁國範，〈真金與權臣的鬥爭〉，《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8（南京：1984），頁 21-27。

<sup>12</sup> F.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67.

薨。<sup>13</sup> 兩年後的正月，忽必烈納娶察必姪女南必為后，繼守正宮。據說，南必頗預朝政，相臣時常無法覲見年近七旬的皇帝，必須「因后奏事」。<sup>14</sup> 南臺御史奏請禪位封章中，除請求忽必烈禪位真金外，更是特別提到「皇后不宜預外事」，<sup>15</sup> 顯見南必對於真金掌政的可能威脅。

其三是兩位同母胞弟——忙哥剌 (Manggala, ?-1280) 與那木罕 (Nomuqan, ?-1291)。世祖正妻察必皇后生有嫡子四人：長子朵而只 (Dorji, b. 1228-1233)，次子真金，三子忙哥剌，末子那木罕。<sup>16</sup> 朵而只早卒，生前未婚而無後，<sup>17</sup> 可以勿

<sup>13</sup> 察必卒年，《元史》的〈世祖紀〉與〈后妃表〉都記為至元十八年，但其本傳誤為至元十四年。有關辨析，以及南必出身和繼守正宮時間的討論，見邵循正，《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元史》，刺失德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頁 1-7、19-65。

<sup>14</sup>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2，〈世祖紀九〉，頁 249；卷 106，〈后妃表〉，頁 2697；卷 114，〈后妃傳一·世祖南必皇后〉，頁 2873。

<sup>15</sup> 李朮魯翀，《菊潭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藕香零拾》本），卷 2，〈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頁 12a。

<sup>16</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2 卷，頁 282-284；蔡巴·貢噶多吉 (Tshal-pa Kun-dga'r do-rje) 著，東嘎·洛桑赤列 (Dung-dkar-blo-bzang-vphren-leg) 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紅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 27。察必另生五女，惜俱失載其名。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 267。其中，俄譯本《史集》列舉忽必烈諸子名字前，已有「這十二個〔兒子〕中最有威望的是察必哈敦所生的四個兒子」云云。所列前四子俱是察必所生。長子朵兒只記為「出生於察必哈敦」，三子忙哥剌「為察必哈敦所生」，四子那木罕「也由察必哈敦所生」，唯獨說次子真金「為被稱作太后的哈敦所生」。但有些人說，她就是察必哈敦，太后為其尊號。這位哈敦出自弘吉剌惕部，『太后』意為合罕之母。」描述真金生母，體例忽變，看似大費周章，實則含糊其詞，只是朦朧推定。而拉施特卻又在他處明白指出察必「的漢語稱號為『皇后』，即正后」。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冊，頁 267。參照其他譯本，令人更添困惑。波義耳 (J. A. Boyle) 英譯本相應處寫到：真金「為正妻弘吉剌部之太后 Tai-khu 所生。太后者，義為『合罕之母』也。」邵循正譯本則稱是「大可敦『太后』所生。可敦出宏吉剌族，『太后』云者，合罕之母也。」另有按語說明太后是「成宗時追稱之語耳。」刺失德丁特 (Rashid al-Din Tabib) 原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277；邵循正，《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刺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頁 21。今按：真金不曾即位，其母察必更是早亡，僅知追諡「昭睿順聖皇后」，未聞封贈太后。以「合罕」之母的「太后」尊號稱呼察必，雙重誤謬，大有問題。伯希和 (Paul Pelliot) 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認為該太后稱號，應是世祖大斡耳朵的帖古倫大皇后所有。可惜他未曾論證，難以令人信服。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 p. 568。基於上述疑義，我有個假說：《史集》對於真金生母的記述，指涉的是其下文遭到遺漏的真金長妻及其諸子生母，亦即闊闢真。所謂「正妻」、「弘吉剌部」、「太后」與「合罕之母」等身分，用於闊闢真身上，完全合適。而闊闢真作為蒙元首位正式尊奉的皇太后，遠在伊利汗國的拉施特 (1247-1318) 可能聞所未聞，難明就裡之下，只能人云亦云，張冠李戴。

<sup>17</sup> 刺失德丁特，《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史集》第二卷》，頁 277。元人提到察必皇后所生諸子，有

論。忙哥刺與那木罕皆有繼承汗位的資格，也都是得到忽必烈著意培養與認真考慮的繼位人選。<sup>18</sup> 那木罕先於至元三年封北平王，八年於阿力麻里 (Almalkh) 建牙鎮戍，十三年為諸王昔里吉 (Shiregi) 劫持，二十一年被遣歸朝而改封北安王。<sup>19</sup>

時會忽略早夭的長子朵而只。例如八思巴於 1278 年寫成的《彰所知論》中，直載忽必烈有真金、彪各刺（忙哥刺）與納麻賀（那木罕）「三子」，更稱真金為「長子」。沈衛榮，《西藏歷史和佛教的語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再論《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頁 164、170。又如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記忽必烈生有二十二子，諸子「最長者名稱成吉思 (Gengis)。蓋追憶韃靼第一君主成吉思汗而取此名也。」馬可波羅著，沙海昂 (A. J. H. Charignon) 注，馮承鈞譯，党寶海新注，《馬可波羅行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 306。所謂「成吉思」顯然是真金之誤。此外，羅茂銳 (Morris Rossabi) 明確將朵而只生年定在 1240 年。Morris Rossabi,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6. 其說所據不詳，恐待商榷。按：忽必烈始婚於 1227 年，元配系出蔑兒乞氏。邵循正，《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元史》，刺失德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后妃考〉，頁 3-4。迎納察必之年，史無明載，但略可考。據虞集為賈禿堅里不花所撰神道碑載，碑主的曾祖父在「甲申 [1224] 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於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於雍吉刺之地。甲午 [1234]，從太宗皇帝滅金。」虞集著，王頌點校，《虞集全集》下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宣徽院使〕賈忠隱公（禿堅里不花）神道碑〔銘〕〉，頁 1059。迎娶時間可以據定在 1224-1234 年之內，更能再作限縮：上限在忽必烈始婚的 1227 年後，下限應在拖雷南下攻金的 1230 年前，亦即在 1227-1230 年間。俄譯本《史集》記朵而只「有一個兒子，名叫阿難答，比阿八哈汗大一歲。」阿八哈乃旭烈兀長子，生於 1234 年。朵而只絕無可能在 1233 年就已結婚生子。據英譯本載，長於阿八哈者乃朵而只，並非阿難答，應是。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2 卷，頁 282；拉施特主編，余大鈞譯，《史集》第 3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頁 99。從而可以推定朵而只之生，最早應在忽必烈與察必成婚的隔年 (1228-1231)，最晚則在阿八哈出生前一年 (1233)，亦即在 1228-1233 年間。察必次子真金生於 1243 年，與長兄有十至十五歲齡差。察必名字不詳的五女可能有在兩子間出生者。

<sup>18</sup> 按真金在至元十年二月被冊為皇太子，卻於隔年正月朝賀世祖後，直至至元十六年十月，前後五年有餘，竟似消失於漢文史籍，令人生疑。王啟龍根據蒙、藏文文獻，認為原因在於真金奉世祖命，負責護送八思巴返藏。王啟龍，《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 205-211。此說殊難置信，似未引起太多關注，猶待論定。姑且無論真偽，多少可以看作真金皇太子之位不甚穩固的一種附會說法。

<sup>19</sup> 張岱玉，《《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論文，2008），頁 159-162。關於那木罕獲釋東還與改封時間，史料記載紛亂矛盾，莫衷一是。陳得芝詳列七條有關史料，檢討先後成說，認為「不能排除海都戰亂道路不靖等借口把那木罕留下，到至元二十年才遣還」，只能暫從舊說，亦即那木罕是在至元二十一年回朝並改封北安王。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中）〉，頁 156-159。其說極是。今有兩條材料堪為補證。一是（萬曆）《滕縣志·李元傳》。傳文有云：「癸未冬，都海王言於篤哇王曰：『北〔妻〕兄留此，瘠甚，儻病死，則構〔怨益深〕。今已遣還國矣。』」楊承父修，王元賓纂，（萬曆）《滕縣志》，《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 29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十三年 (1585) 刊本），卷 8，〈人物傳下·武功·元李元〉，頁 136。引文闕字另據《道光滕縣志》補。王政修，王庸立、黃來麟纂，《道光滕縣志》，《中國地

忙哥刺封王最晚，至元五年即以親王出鎮，但直至九年始封安西王，授螭紐金印，賜京兆（治今陝西西安）為分地，駐軍六盤山。據王宗維研究：忙哥刺從出鎮到封王期間，都是世祖考慮的皇太子候選人之一，直至確定以真金為太子，方封王號以安其心。<sup>20</sup> 至元十年，真金被立為太子。隔年，益封忙哥刺為秦王，別賜獸紐金印，一藩二王，綰二金印，兩府並開，沒有先例，地位十分尊榮。然而，忙哥刺大約卒於至元十六年七至十一月，無法對其後政局有所影響。<sup>21</sup> 有學者認為忽必烈參考蒙古左中右三大分區的傳統，將自己直接統轄領地分為中部、西部和北部建立的「三大王國」，分別交由真金、忙哥刺與那木罕統領，從而構成忽必烈王朝的基本骨架。三大王國都在繼任汗位享有特殊資格，必須通過彼此爭奪以贏取汗位。<sup>22</sup> 而真金成為皇太子，係依漢制所行的重大決策，但在蒙古諸王宗親觀念中，卻仍據舊俗，只是將之視為大汗對其嗣君的提名。<sup>23</sup> 職是之故，那木罕被劫前，忽必烈就曾屬意由他繼承大位，而他歸朝後仍心存想望。<sup>24</sup> 忙哥刺主政關中期間，對於汗位亦有覬覦，顯露不臣之心，而《心史》所謂「嘗謀篡父位，事泄為父殺」，或非全屬虛造。<sup>25</sup>

綜而言之，上述三方政治勢力無不與真金之父，亦即當朝皇帝忽必烈有關。忽必烈汗晚年縱然趨於保守，疏於理政，但權威不容觸犯，即便是漸掌實權的皇太子亦不例外。於是禪位風波一起，雖然得以平息，卻已動搖真金地位，終於讓他惴惴不安至死。而真金之死，無疑為忽必烈接班人的選定，投下了重大變數。

---

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 75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卷 8，〈人物志·武功·元李元〉，頁 205。引文之「都海王」顯係「海都王」之誤；「北妻兄」應即北平王那木罕，「妻兄」之稱不悉何故。從而可知那木罕確曾為海都留滯，直至癸未年（至元二十年）冬天左右方得歸元。二是《元史·田忠良傳》。據載，那木罕與安童被劫後，忽必烈曾召傳主祀神致禱，得到如此回應：「無事於神，皇子末年當還。」後果如其言。所謂當還之末年，應指癸未年，可與李元傳文相互印證。宋濂等，《元史》，卷 203，〈方技傳·田忠良〉，頁 4537。

<sup>20</sup> 王宗維，《元代安西王及其與伊斯蘭教的關係》（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頁 18。

<sup>21</sup> 張岱玉，《〈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頁 17-19。

<sup>22</sup> 杉山正明著，孫越譯，邵建國校，《蒙古帝國的興亡》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16-17。

<sup>23</sup> 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頁 42。

<sup>24</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2 卷，頁 352。

<sup>25</sup> 陳廣恩，〈元安西王忙哥刺死因之謎〉，《民族研究》，3（北京：2008），頁 96-104。

### 三、至元二十八年：真金子嗣承繼大位的確立

至元二十二年真金過世後，他的遺孀闊闕真所面臨的處境，在姚燧（1238-1313）所撰〈普慶寺碑〉有頗為精采的描寫。茲抄錄如下：

在疚煢煢，茹荼與蓼。上以慰安大帝于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夭，皆俾不大蠹傷乃心；下為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關政于家，則曰：「于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sup>26</sup>

可見闊闕真承受喪偶哀痛之餘，謹守分際，韜晦藏用，成功扮演「承上」、「立中」與「啟後」三重角色。換言之，她既要承歡年邁的皇帝家翁，藉以鞏固政治權力基礎；又要寬慰成年的三子，使之做好繼承皇位的準備；更要培育年幼的二孫，亦即日後的武宗（r. 1307-1311）與仁宗（r. 1311-1320），令其成為未來治國的儲備人選。

三重角色中，取得世祖信任自是首要課題。闊闕真的聰慧表現，顯然獲得忽必烈的肯定。上引漢文碑文外，波斯文文獻也有相應記載：「〔合罕〕立了真金為帝。他在位三年，也去世了，其寶座則被封存起來。他的妻子闊闕真很聰明，合罕對她很賞識，她的一切命令都照執行。」<sup>27</sup> 她被執行的「一切命令」，指涉含糊，難免誇大。合理的解釋是，闊闕真恐無對朝政置喙的餘地，只有忽必烈「關政于家」之際，方能表示意見。換言之，她的命令執行範圍有限，應以上引碑文所謂「內飭宮臣之率職」為主，而對內告誡奉行職事的太子屬官，亦即真金遺下的詹事院諸臣。

<sup>26</sup> 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卷 11，頁 159。引文標點有所更動。另，碑文無明確寫作年月，但據文中稱仁宗為「今皇上」與「聖上」，可知應撰於仁宗朝。

<sup>27</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2 卷，頁 352-353。



真金死後未久，位下詹事院無主，朝中出現建請裁撤的議論，但因時為詹事丞的張九思 (1242-1302) 極力反對而終獲保留：「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之！」<sup>28</sup> 詹事院得以保存，張九思抗言固然功不可沒，而世祖對於闊闊真的賞識，或許才是更為重要的原因。畢竟世祖在真金後就未再立儲君，闊闊真成為詹事院名義上的主人後，「聖上君父大見倚重」，使得「詹事之司未嘗一日廢闕，以見皇天定命於青宮之位。」<sup>29</sup> 在闊闊真的主持下，詹事院不僅成為維繫先夫舊臣的重要機構，並得藉以積蓄支持諸子繼任皇位的政治實力。

闊闊真堅守待變，隨著政治情勢發展，開始轉而對其母子有利。前述曾經威脅真金的三方政治勢力漸現消退跡象。其中的關鍵，竟在於世祖任用的第三位理財大臣桑哥 (Sengge, ?-1291) 的上臺。至元二十四年，桑哥正式柄政，由於真金太子已死與御史臺臣不職，沒有掣肘，更加肆無忌憚，勢燄薰天。<sup>30</sup> 他在掌權期間，曾對忙哥剌繼承者與那木罕加以攻詰，試圖削弱兩位強藩親王的勢力。

先說桑哥對於忙哥剌繼承者的處置。他在上臺當年的十月，就對安西王相有印一事上奏：「北安王王相府無印，而安西王相獨有印，實非事例，乞收之。」<sup>31</sup> 隔月，再對忙哥剌之子得以一藩二王，表示質疑：「先是皇子忙哥剌封安西王，統河西、土番、四川諸處，置王相府，後封秦王，綰二金印。今嗣王安難答仍襲安西王印，弟按難不花別用秦王印，其下復以王傳印行，一藩而二王，恐於制非宜。」<sup>32</sup> 事實上，在忙哥剌死後，世祖已經逐步剝除安西王諸項特權。桑哥兩度進奏，或是揣摩上意而為，奏言獲得允可與執行，無疑更是落井下石。此後，安西王府規格仍高，但已「成為一個只是大汗的近支藩王」，地位不復忙哥剌當年繁盛。<sup>33</sup>

再論桑哥對於那木罕的告發。至元二十一年，那木罕獲釋歸朝。據《史集》載，他不滿忽必烈確認真金為皇位繼承人，頗有微詞，甚至惹怒乃父，「把他大罵一頓，從自己身邊趕開，並說道：『不許再來見我！』」該書接著提到那木罕過了幾天即死。<sup>34</sup> 這段忽必烈父子對話的敘事時間頗見含混，又多與史未合，恐難盡

<sup>28</sup> 宋濂等，《元史》，卷 169，〈張九思傳〉，頁 3981。

<sup>29</sup>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26，〈傳國璽〉，頁 319。

<sup>30</sup> 王頌，《龍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箕斂集財——元世祖任用斂臣的實質與結果〉，頁 257。

<sup>31</sup> 奏文另外提到諸王勝納合兒「皇姪貴宗之寶」的印文恐非人臣宜用，建請改為「濟南王印」。宋濂等，《元史》，卷 14，〈世祖紀十一〉，頁 301。

<sup>32</sup> 同前引，頁 302。

<sup>33</sup> 張岱玉，《《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頁 153。

<sup>34</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2 卷，頁 352。

據。<sup>35</sup> 事實上，那木罕回朝後，賜北安王印，隨即再度出鎮漠北。這或許就是《史集》所謂忽必烈汗將他「從自己身邊趕開」之說的祖源。屠寄 (1856-1921) 從父子親情立論，主張上引《史集》所言非虛：「那木罕既為愛子，忽必烈汗正當留侍左右，使享安樂，以償其前者遠戍久羈之苦。乃歸朝不久，遽令再出北邊，……久而不召，使非因怨望遭怒，必不至此。則西書之說，大足補《元史》之闕也。」<sup>36</sup> 其說即便合乎情理，卻乏實證。那木罕係世祖嫡幼子，在蒙古繼嗣傳統原具優越地位，<sup>37</sup> 何況在真金死後更成唯一僅存之嫡子，覬覦皇位，理所當然。周良霄注意到《元朝名臣事略》卷二〈安童傳略〉所引《野齋李公文集》，指出那木罕以「皇子僭祭岳瀆」，僭越受譴，確有其事。<sup>38</sup> 劉迎勝進一步考證那木罕遣使降香，事在至元二十三與二十四年間，起因係桑哥藉以構陷政敵安童 (An-t'ung, 1245-1293) 的知情不報。<sup>39</sup> 蒙元對於岳鎮海瀆的祭祀權力，從世祖朝開始收歸皇帝獨有，但諸王遣使代祀情形不曾禁絕，更未曾聞有相關罪責。那木罕在真金病逝後，連續兩年祭祀岳瀆，確實難免爭儲之嫌。<sup>40</sup> 桑哥用來借題發揮，雖以牽連安童為首要目標，但他敢於得罪那木罕，似乎說明後者在回歸後的政治地位已有所削降。<sup>41</sup>

然而，那木罕僭祭事件既未擴大，影響可能有限。他仍然得以總鎮漠北，手握重兵，甚至屢嘗敗績，卻能維持權勢不墜，猶能向朝廷薦用部屬。茲舉一例為證。李伯堅（生卒年不詳），名以鑣，契丹 (Khitai) 人。自幼即以世家子入事那木罕，負責管理其保定（治今河北保定）分地，前後五年，頗著政績，「郡嘗被水災，力請於朝，多所蠲復，郡人賴之」。那木罕入朝京師，「有司被王教，宜奏公宣慰一道」。將從二品的宣慰使職用來酬庸投下家臣，朝中官員甘受令旨，配合演出，威勢可見一斑。那木罕入朝時間不詳，但李氏「當往荊湖」之詔下於至元二十

<sup>35</sup> 前已提到《史集》說真金被立為「合罕」，實是被立作太子的誤解。至於冊立太子的時間（至元十年），也被誤繫於那木罕南歸（至元二十一年）之後。

<sup>36</sup> 屠寄，《蒙兀兒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4），卷 76，〈忽必烈可汗諸子傳·北安王那木罕〉，頁 10a。

<sup>37</sup> 蒙古家族原本存在幼子守灶的風俗，亦即所謂末子相續制度。島田正郎，《北亞洲法制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1964），頁 19-20；後藤富男，《內陸アジア遊牧民社会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頁 233-249。

<sup>38</sup> 這是周良霄譯注《史集》第二卷時所加按語，見刺失德丁特，《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史集》第二卷》，頁 372。

<sup>39</sup> 劉迎勝，《蒙元史考論》（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從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題〉，頁 378-381。

<sup>40</sup> 馬曉林，〈元代岳鎮海瀆祭祀考述〉，《中國史研究》，4（北京：2011），頁 136-137。

<sup>41</sup> 劉迎勝，《蒙元史考論》，〈從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題〉，頁 379。

七年二月十五日，已在僭祭事件後，足證北安王影響力未減。李伯堅臨行之際，保定諸公賦詩以贈，劉因（1249-1293）作序，並題五言古詩一首，有句云：「有子父乃顯，觀臣王可知。榮親與報王，勉力在此時。」<sup>42</sup> 所謂觀臣可知之「王」，欲報之「王」，詩無達詁，卻不免語涉雙關，引人懸揣。

那木罕歸朝以後，得以長保權位，統帥漠北諸軍，屠寄曾經推測其象徵意義：「忽必烈汗果深怒那木罕，欲立皇孫鐵穆耳為嗣，何不於至元二十三、四年間即行冊立之禮？必待那木罕薨後，始用玉昔帖木兒之言，以皇太子寶授鐵穆耳。知那木罕未薨以前，忽必烈汗尚有立之之意。」屠氏自認其說為「獨得之間」，誠乃中西史籍所未能明言。<sup>43</sup> 事實上，這是有待論證的說法，尤以那木罕卒於乃父忽必烈死前與否為其關鍵。

關於那木罕之死，波斯史家拉施特沒有提供明確年月，卻在不同記述中三度提到他的亡故，十分混亂。三處記載，大抵而言，都在說明那木罕被送回忽必烈身邊後，或是「過了一年」，或是「過了幾天」，又或是過了「不久」，就已去世。<sup>44</sup> 無論如何，這些說法顯然俱誤：那木罕於至元二十一年釋歸，隨即再次出鎮漠北，直到五年後（至元二十六年）仍然屢見記載。<sup>45</sup>

那木罕死期，在漢文史籍方面，以《元史》最為重要。但是，《元史》既在〈世祖紀〉文隻字未提，又因其他兩處史文的矛盾，致使學者各執所見，莫衷一是。其一是據〈泰定帝紀〉與若干旁證，推定在至元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間。<sup>46</sup> 屠寄即主是說，認為「北安王之薨，即在至元二十九年，但不詳其月日耳。」<sup>47</sup> 另一是據〈諸王表〉明文，確定於大德五年（1301）。<sup>48</sup> 二說的時間相差將近十年，不可謂短，何況期間歷經世祖死後選立新君的忽里勒台（khuruldai，蒙語「會議」之意）。同時，二說也各存疑義：前說問題在於無法否定後說的明文記載；後說破綻則是那木罕既然未死，他在至元二十九年突然消失於史冊，純粹以失勢為由，恐怕無法令人信服。

<sup>42</sup> 以上有關李伯堅的事跡及引文，見劉因，《劉文靖公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第93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明成化十五年（1479）蜀藩刊本），卷2，〈李伯堅宣慰荊南并序〉，頁8a-8b。李伯堅之字，另見同前引，卷19，〈少中李公名字說〉，頁3b-4a。

<sup>43</sup>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76，〈忽必烈可汗諸子傳·北安王那木罕〉，頁10a。

<sup>44</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2卷，頁317、352、378。

<sup>45</sup> 劉迎勝，《蒙元史考論》，〈從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題〉，頁369-377。

<sup>46</sup> 張岱玉，《〈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頁163。

<sup>47</sup>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76，〈忽必烈可汗諸子傳·北安王那木罕〉，頁9b。

<sup>48</sup> 劉迎勝，《蒙元史考論》，〈從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題〉，頁358-359。

馬曉林在其博士論文中，援引長年服事那木罕的私臣兼連襟——李元（1235-1318）的傳記與墓志，作為直接證據，進一步肯定至元二十八年左右逝世說的可信。<sup>49</sup> 這是很有意義的補證，但可再作申說。為便討論計，請先引錄李元傳文如次：

癸未〔按：至元二十年〕冬，……明年〔按：甲申，至元二十一年〕夏，……授奉訓大夫、北安王司馬。……辛卯〔按：至元二十八年〕夏，以便事白。王下令斥姦邪，舉廢弛，去苛虐，汰冗濫，諸弊一新。未幾，王薨，元為之行喪禮。踰年，遷太中大夫、都總管府達魯不花赤。<sup>50</sup>

據載，那木罕可以確定卒於至元二十八年夏後不久，而在李元「踰年」遷官之前。踰年，或謂一年後，或謂超過一年，都有可能。幸有李元墓志可供比勘。墓志記事稍簡，略及家世、歷官與妻兒，遷官年次則都具載。以志文對讀傳文，建白北安王事雖闕，所任官職卻同，而傳文所謂「踰年」，志文明確記為壬辰年，亦即至元二十九年。<sup>51</sup> 那木罕逝世年月可據以再定為至元二十八年夏與二十九年間，確切日期則可藉由元末熊夢祥（生卒年不詳）《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的記載予以考定。按〈行香〉篇明載那木罕愍忌，亦即生日為六月二日；週年，亦即卒日為七月四日。對照上引李元傳文，所謂那木罕在至元二十八年夏後「未幾」薨逝，應該就在當年七月四日。<sup>52</sup> 總而言之，根據《元史·諸王表》明文，以大德五年為那木罕死期的說法恐誤，而表文所謂「大德五年薨」，疑涉重複下文鎮南王脫歡（Toghon, ?-1301）所記薨年以致誤。<sup>53</sup> 由於那木罕只生二女，沒有子嗣，<sup>54</sup> 爭逐大

<sup>49</sup> 馬曉林，《元代國家祭祀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2），頁195-196。

<sup>50</sup> 楊承父修，（萬曆）《滕縣志》，卷8，〈人物傳下·武功·元李元〉，頁50b-51a；王政修，《道光滕縣志》，卷8，〈人物志·武功·元李元〉，頁6a-6b。引文末句「達魯不花赤」，「不」字衍誤。

<sup>51</sup> 石晶、呂文，〈李元墓志及其史料價值〉，《棗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1.6（棗莊：2004），頁38。

<sup>52</sup> 《析津志·原廟·行香》篇文的疏理，參見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臺北：2008），頁1-40。

<sup>53</sup> 《元史·諸王表》記有北安王賜印、薨逝與賜諡三事的年代，分別是至元十九年、大德五年與延祐七年。其中，至元十九年賜印，已經前人指出，應是二十一年之誤。韓百詩（Louis Hambis）著，張國驥譯，《元史·諸王表箋證》（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頁169。今又證明薨逝之年有訛，獨見於此的賜諡之事，恐亦難保無疑。

位的機會自是及身而絕。

至於當初揭發北安王僭祭事件的桑哥，先在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倒臺，隨即遭到清洗，更在那木罕卒後第十八天，亦即七月二十二日伏誅。桑哥與那木罕死於同年同月，政治勢力版圖勢必隨之重組，不問可知。南必皇后原是可能的得利者之一。南必於至元二十年繼守正宮，至此已歷八年。她與忽必烈生有一子鐵蔑赤（Temeči，生卒年不詳），既是正宮所出而為廣義的嫡子，同樣具備角逐皇位繼任者資格。但是，鐵蔑赤可能在至元二十九年夭逝，南必的處境——生有一子早亡而未再得男，猶如忽必烈長妻忽魯黑臣（Qoruqchin），由於失去可供操作的政治資本（親生子嗣），只能慢慢地淡出政治的舞臺。<sup>55</sup>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桑哥論罪罷廢。此後，直至七月遭到處決，這位權臣及其黨羽，歷經一系列的清洗。桑哥既罷，選任新相關乎政治勢力重組，甚至是對於久虛儲位的確認。茲事體大，使得高齡七十七歲的忽必烈頗費思量。忽必烈於是「咨問廷臣」，<sup>56</sup>「博選於眾」，<sup>57</sup>前後徵詢大臣不知凡幾。至今猶可考知的僅餘幾段君臣對話，包括：不忽木（Buqumu, 1255-1300）、燕公楠（1241-1302）、賀勝（1264-1320）與張留孫（1248-1321）等人。他們各自出身、歷官與君臣關係各異，有助於思考選相問題的不同重點。以下逐一討論之。

不忽木，康里（Qangli）人，忽必烈潛邸近臣燕真（Eljin，生卒年不詳）之子。燕真未及大用而卒，忽必烈撫育其子，有「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sup>58</sup>不忽木自幼奉命給事真金，師事漢儒，受到悉心培養，成為難得的非漢族儒臣。桑哥敗廢後，世祖原先屬意的丞相人選就是不忽木，卻被他本人固辭，並推讓給太子詹事完澤（Öljei, 1246-1303）。不忽木辭讓的理由，今存他的三種主要傳記資料——《元史》本傳、姚燧所撰〈神道碑〉與趙孟頫（1254-1322）所撰〈康里公碑〉俱載，前二種詳略有別，可以相互補充，而〈康里公碑〉的記述更為直截。據《元

<sup>54</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2卷，頁284。

<sup>55</sup> 另據南必繼守正宮後的《元史·世祖紀》文與有關史事，可知當時軍國大事仍由重臣親自進奏，而由世祖獨斷，似未留下南必干政的蛛跡。許正弘，〈杭州飛來峰元至元二十九年造像題記疏證〉，《中華佛學研究》，17（新北：2016），頁78-81。

<sup>56</sup> 宋濂等，《元史》，卷130，〈完澤傳〉，頁3174。

<sup>57</sup> 蘇天爵輯撰，姚景安點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4，〈丞相興元忠憲王〉，頁54。

<sup>58</sup> 趙孟頫著，任道斌校點，《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7，〈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康里公碑〉，頁160。

史》本傳與〈神道碑〉載，不忽木認為朝廷勳舊齒爵都在其上者仍多，丞相一職又例以蒙古人出任，自己任相將是破格提拔。而他推薦的完澤，既不賂遺理財大臣，又對桑哥執政敗國之事早有洞見，堪當重任。〈康里公碑〉特別先敘「是時上春秋高，成宗將兵北方，位號猶未正」，使得其後忽必烈與不忽木的君臣對話，饒富更多政治意義的解讀，不限於純就個人任相資格的討論。據載，不忽木認為「相東宮舊臣，則眾論自定，國家自安矣」，忽必烈聽後沈默許久，嘆息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sup>59</sup> 任用真金舊臣為相，等於可使鐵穆耳作為儲君的「位號」得正，平息紛紛的眾議。這段對話雖然頗有疑問，畢竟至元二十八年尚無所謂「成宗將兵北方」，<sup>60</sup> 但至少代表時人對於完澤任相象徵意義的解讀。

燕公楠，字國材，號五峰，南康建昌（治今江西永修）人。宋末歷官贛州（治今江西贛州）通判；宋亡，元授贛州同知。至元二十二年，奏對稱旨，賜蒙古名並命參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浙行省事。二十七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桑哥既敗，公楠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有意改易政府大臣之際，向他徵詢適任名單。他先是推薦伯顏 (Bayan, 1237-1295) 與不忽木等十餘人，又問首相人選，則依序以安童、伯顏與完澤作答。<sup>61</sup> 世祖不用出將入相而有滅宋奇功的伯顏，可能與他當時早已奉命出鎮和林 (Qorum, 治今蒙古國前杭愛省哈爾和林) 有關。<sup>62</sup> 捨棄最孚人望的資深首相安童回任，並免去其屢已求辭的中書右丞相職，<sup>63</sup> 理應別有內情。劉迎勝從那木罕與安童同時被俘的「患難之交」，並據《元朝名臣事略》所引《野齋李公文集》，推測兩人「是一個相互交往密切的小圈子」。<sup>64</sup> 這或許就是世祖考量因素之一。安童罷相後，那木罕也漸退出皇位競逐行列，直至半年之後亡故。

賀勝，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十六歲以大臣子備宿衛，甚受世祖器重，得以與聞軍政機密。至元二十四年，隨世祖親征有功，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一

<sup>59</sup> 同前引，頁 159。

<sup>60</sup> 據《元史·成宗紀一》載，成宗曾於至元二十四年左右受命往征乃顏餘黨，三十年六月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宋濂等，《元史》，卷 18，頁 381。

<sup>61</sup> 燕公楠《元史》本傳與其〈神道碑〉對於推薦大臣名單（傳無帖哥之名），以及可任首相人選（傳無伯顏之名），記述略有小異。應以碑文為是。同前引，卷 173，〈燕公楠傳〉，頁 4051；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程鉅夫集》，《元代別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卷 21，〈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神道碑銘〉，頁 253。

<sup>62</sup> 宋濂等，《元史》，卷 127，〈伯顏傳〉，頁 3113-3114。

<sup>63</sup> 同前引，卷 126，〈安童傳〉，頁 3084。

<sup>64</sup> 劉迎勝，《蒙元史考論》，〈從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題〉，頁 381。

品服。二十八年，桑哥敗後，世祖「卜相」之際，曾向賀勝徵詢「當吾心者」。他回答說：「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完澤任相，而以賀勝為參知政事。<sup>65</sup> 所謂世祖「卜相」，可以泛稱選擇相才，在此卻可能是確有其事。完澤任相雖獲眾口同聲交薦，世祖也已心中有數，但仍不免疑惑。世祖特命平素「事之如神明」的玄教宗師張留孫占卜，卜得「同人之豫」卦相而經留孫詳解，確認「所擬為無疑」，不久即有拜相之舉。<sup>66</sup>

從桑哥罷官（正月二十三日）到完澤拜相（二月九日），關涉固然重大，落定卻在半月之內。忽必烈年屆垂暮，正宮皇后察必和皇太子真金接連去世的打擊，加上國內外決策的挫敗，飲食習慣帶來的健康問題，都是莫大的考驗。<sup>67</sup> 不過，他的命相經驗異常豐富，<sup>68</sup> 決斷依舊明快。完澤得以膺選，個人才具與功勳顯非考量的重點。他除符合任相所需蒙古世勳根腳的資格外，獲得群臣輿論支持的關鍵，在於具有真金舊臣的象徵意義。

完澤，系出蒙古土別燕（Tübagān）氏。他的祖父在亡金攻宋戰爭從征立功；父親更是世祖潛邸宿衛，隨從北征，還拜宣徽使，後進中書右丞相，與諸儒臣論定朝制。他與真金淵源既早且深。中統三年，詔選大臣子充燕王真金王府僚屬，完澤以賢應選。<sup>69</sup> 至元十九年十月，詹事院初立，官拜右詹事，<sup>70</sup> 「入籌帷幄，出掌環衛」。真金曾在會宴宗室之際，公開稱揚完澤為不易得的「善人」，甚是器重。真金死後，完澤仍以太子右詹事之職，負責統理東宮衛軍。<sup>71</sup> 拜任尚書右丞相之

<sup>65</sup> 虞集，《虞集全集》下冊，〈賀〔丞相〕忠貞公（勝）墓誌銘〉，頁 884。

<sup>66</sup> 同前引，〈張宗師（留孫）墓志銘〉，頁 975；袁桷著，李軍、施賢明、張欣校點，《袁桷集》，《元代別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卷 34，〈有元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家傳〉，頁 493。

<sup>67</sup> Morris Rossabi, *Khubilai Khan*, pp. 224-227.

<sup>68</sup> 世祖「在御三十四年，命相幾二十餘人。或解罷，或斥逐」。袁桷，《袁桷集》，卷 34，〈有元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家傳〉，頁 494。元代宰相平均任期之短，可說是一顯著的特色，參詳張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71-72。

<sup>69</sup> 完澤傳記資料以閻復所撰〈丞相興元忠憲王碑〉為主。閻復，《靜軒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藕香零拾》本），卷 3，頁 20a-21a。閻碑後為蘇天爵節錄輯入《元朝名臣事略》，又為《元史》節略修改以為本傳。蘇天爵輯撰，《元朝名臣事略》，卷 4，〈丞相興元忠憲王〉，頁 53-55；宋濂等，《元史》，卷 130，〈完澤傳〉，頁 3173-3174。下敘完澤事跡，倘未出注，大抵以閻碑與《元史》本傳為準。

<sup>70</sup> 宋濂等，《元史》，卷 12，〈世祖紀九〉，頁 247。

<sup>71</sup> 所謂東宮衛軍，應是真金在世期間設置的東宮侍衛軍與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下轄者。真金死後，衛軍並未撤銷，應仍隸以閻闕真為主的詹事院。史衛民，《元代軍事史》，《中國軍事通

際，仍官右詹事。尚書省政罷歸入中書後，改任中書右丞相，詹事官職是否尚予保留，史無明文。<sup>72</sup> 但是，完澤顯然在朝廷樞要的中書省與以闊闊真為主的詹事院間，起到居中協調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完澤執政後，「中書六曹慎簡僚屬，諸以桑葛為官者皆免」，<sup>73</sup> 詹事院舊臣成為補充闕員的人選。其中，既有完澤親自拔擢為工部主事的韓冲（1250-1332），<sup>74</sup> 也有群臣推舉為禮部尚書的王倚（1240-1292）。<sup>75</sup>

完澤拜相，不僅看中他具蒙古世勳的出身，更是著重他乃真金舊臣的關係。不過，完澤似未完全取得世祖的親任。蕭啟慶（1937-2012）早已指出：「自中統建省以來，大權皆在平章政事之手，丞相多位崇而不任事」。<sup>76</sup> 世祖當時確以天下事付託平章政事不忽木，用之恨晚，倚仗為左右手，<sup>77</sup> 宣稱「非卿無以任吾事」。<sup>78</sup> 不忽木幼事真金，雖不以「東宮舊臣」自居，但顯非真金後人之敵。他在有人譖構完澤徇私而被世祖召問時，以自己同位宰輔作為背書，建言世祖應使言者當面對質，不可內懷猜疑，從而保全完澤的政治地位。<sup>79</sup> 朝廷之上得到世祖重臣支持，完澤權位漸趨穩固，而朝廷之外尚有機會爭逐大位的那木罕，仍是可能的政敵。前文討論那木罕卒期，引據其私臣李元傳文，所見傳主事跡的記述值得提請注意。李元於至元二十一年歸朝，旋授北安王司馬。此後，直至二十八年建白革新，七年間行事竟無隻字片語。這段期間，漠北戰事頻傳，史文縱有闕漏，恐怕不致毫無可採，疑應有故。李元建白北安王而大肆革弊的時間，適在完澤任相的數月後，挽回世祖聖心的企圖，更是引人懸揣。無論如何，那木罕大限不久即至，一切盡成徒然。

史》第14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222-223。

<sup>72</sup> 宋濂等，《元史》，卷16，〈世祖紀十三〉，頁347。完澤於至元三十一年正月所見官銜為「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疑已不再兼任詹事院職。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6，〈傳國璽〉，頁318。

<sup>73</sup> 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2，〈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吳公行狀〉，頁369-370。

<sup>74</sup> 原為詹事院架閣庫管勾。同前引，卷12，〈元故奉元路總管致仕工部尚書韓公神道碑銘并序〉，頁182。

<sup>75</sup> 原為太子家丞。王倚因病辭任尚書，闊闊真召見時以「人皆欲進，卿獨求退」為問。劉因，《劉文靖公文集》，卷20，〈正議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頁9a-9b。

<sup>76</sup> 蕭啟慶，《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頁72。

<sup>77</sup> 趙孟頫，《趙孟頫集》，卷7，〈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康里公碑〉，頁159-160。

<sup>78</sup> 宋濂等，《元史》，卷130，〈不忽木傳〉，頁3169。世祖所謂「吾事」甚至包括臨終的顧命。

<sup>79</sup> 同前引，頁3170。



隨著那木罕的逝世，察必皇后所生四位嫡子至此俱亡，而南必皇后之子鐵蔑赤即便在世，恐亦太幼。皇位繼任自以嫡孫為首要，甚至是唯一選項。世祖嫡子僅真金與忙哥刺二人有後，世祖於忙哥刺死後逐步削除安西王特權，真金舊臣完澤卻得拜相，彼此政治權勢高下判然。完澤拜相，表示世祖已有選擇真金諸子繼位的準備，只是甘麻刺（Kammala，1263-1302，追上廟號顯宗）三兄弟由誰勝出，沒有正式而明確的宣告，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 四、至元三十年：鐵穆耳即位優勢的形成

闊闊真三子，次子答刺麻八剌在至元二十八年奉詔出鎮懷孟（治今河南沁陽），未至就以疾召還治病，隨於隔年五月亡故。皇位角逐者只餘長子甘麻刺與幼子鐵穆耳兄弟二人。今存杭州飛來峰西麓呼猿洞第 98 與 99 龕的兩段佛龕造像題記，比鄰鑄造，鑄造時間同在至元二十九年仲秋吉日。這兩段題記，對於當時政治情勢有所折射，頗富史料價值。細繹兩條題記所見造像功德回向對象序列，看似習見的造像祈願套語，卻能看出造像者的精心安排。回向的對象，除百官、自身及其子孫外，更為重要的是帝室成員——皇帝、妃子與兩位太子。皇帝指的是元世祖，而其後的闊闊真妃和甘木羅、帖木兒兩位太子，則是已故皇太子真金遺孀闊闊真及其甘麻刺和鐵穆耳二子。<sup>80</sup> 兩龕題記提到皇帝與闊闊真妃，兩者同列，其間只有一字空白的挪抬。這可以證明闊闊真在當時政治地位的尊崇，也表示甘麻刺和鐵穆耳兩位太子就是角逐下任皇帝的候選人。至於闕列當朝皇后南必之名，更是代表她已非闊闊真母子的對手。<sup>81</sup>

甘麻刺與鐵穆耳兄弟角逐大位，可說各擅勝場。甘麻刺既由世祖夫婦隔代撫育長立，又且位居嫡長，政治地位的優越，略無疑問。至元二十一年冬，他原欲延請釋普仁至太子宮府而遭辭拒，轉而出備財物，並命大都留守與詹事丞於隔年春天為普仁起建新寺，名曰天慶。<sup>82</sup> 當時只是「皇孫」而未正式受封的甘麻刺，竟能使命朝廷與東宮官員建寺，權勢可見一斑。二十三年，亦即真金死後隔年，他就已奉

<sup>80</sup> 甘麻刺是否為闊闊真親生子，曾經引起質疑，甚至形成闊闊真偏向親生子鐵穆耳繼立的推論。我對此已有明確考辨，應可確定闊闊真與甘麻刺的母子關係。許正弘，〈杭州飛來峰元至元二十九年造像題記疏證〉，頁 73-77。

<sup>81</sup> 對於這兩段題記意義的闡發，見同前引，頁 61-87。

<sup>82</sup> 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57，〈大元國大都創建天慶寺碑銘并序〉，頁 2547。

詔出鎮漠北，後又改封雲南。二十八年，那木罕死後絕嗣，遺下極具政治象徵意義的「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重責，隔年就由甘麻剌改封晉王出鎮以為承繼。<sup>83</sup> 三十年四月，元廷為晉王置內史府，首長秩從二品，地位迥出一般王傳之上，具有品秩高、員額多、享官俸或可遷轉等特徵。<sup>84</sup> 屠寄甚至據以推論世祖「本欲以甘麻剌為皇太孫，故特崇其府制」。<sup>85</sup> 屠氏之說不無道理，然而世祖聖心所屬並非毫無端倪可尋，關鍵仍在於完澤的拜相。完澤於真金死後，典主東宮衛兵，而在鐵穆耳撫軍北方之際，又受詔總治軍旅，兩度輔佐從征。完澤與鐵穆耳關係密切，據以推測世祖任相人選，應該不無深意。此外，忽必烈逝世前，曾派內侍宣諭闊闊真，特別推薦張留孫，說：「張上卿，朕舊臣，必能善事太子」。<sup>86</sup> 世祖所謂「太子」，闊闊真顯然認定就是鐵穆耳。無論是對於世祖意向的揣度，或是出於愛憐少子的私情，<sup>87</sup> 闊闊真在兄弟二人間確有支持鐵穆耳的傾向。這無疑對於鐵穆耳的繼統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鐵穆耳幼年事跡鮮見史載。這無足為奇。畢竟鐵穆耳在登上皇位前，只是諸皇孫之一，沒有特殊表現的話，就無特別留下紀錄的必要。<sup>88</sup> 至元十五年，鐵穆耳年方十四，闊闊真召請阿失帖木兒 (Aši Temür, 1249-1309) 教授他與兄長甘麻剌畏兀字。<sup>89</sup> 這條資料似是他早年生活的唯一紀錄。至元二十四與二十五年間，他兩度奉命率軍討伐東道諸王之亂，建立戰功，嶄露頭角，開始登上政治舞臺。<sup>90</sup> 此後，直到至元三十年六月總兵漠北前，文獻上幾乎再度失去他的蹤影。至元二十九年，世祖為求加強對於漠北統治與邊防，下命晉王甘麻剌出鎮。隔年六月，又以皇

<sup>83</sup> 宋濂等，《元史》，卷 29，〈泰定帝紀一〉，頁 637。

<sup>84</sup> 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元代晉王封藩問題探討〉，頁 329。

<sup>85</sup>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 8，〈忽必烈可汗紀六下〉，頁 40b。

<sup>86</sup> 袁桷，《袁桷集》，卷 34，〈有元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張公家傳〉，頁 493。

<sup>87</sup>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 118，〈阿魯渾薩理傳〉，頁 4b。甘麻剌雖為闊闊真親生，兩人母子關係卻頗疏離。闊闊真與真金於 1258 年成婚，五年左右生下長子，此後二年接連舉子。同時照護年歲密邇，只有一二歲之差的三子，誠屬難能。真金夫妻選擇將長子交給世祖夫婦，隔代育養成人。至元二十三年，亦即真金死後隔年，二十四歲的甘麻剌，已經奉詔出鎮漠北。此後，改封雲南，重返漠北，無不長年在外。當闊闊真與長子甘麻剌在世祖崩後的選汗大會再行聚首，她對於少子容有偏袒，或許尚在情理之中。

<sup>88</sup> 忽必烈早年生活經歷的記載同樣有限，倘無其兄蒙哥繼任大汗等一系列變故，可能只是一位平凡的宗王。見 Morris Rossabi, *Khubilai Khan*, pp. 13-14.

<sup>89</sup> 程鉅夫，《程鉅夫集》，卷 7，〈武都忠簡王神道碑〉，頁 75。

<sup>90</sup> 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中）〉，頁 161。

太子寶授予鐵穆耳，負責總領北方軍務。<sup>91</sup> 鐵穆耳日後順利取得帝位，總兵北邊取得的武力與資望，以及世祖重臣的擁戴，的確發揮主要作用。此外，授皇太子寶雖僅代表「付以撫軍之任」，<sup>92</sup> 但賴以形成的政治優勢，同樣不容小覷。

世祖授寶的決定，除出自輔佐鐵穆耳撫軍的勳貴玉昔帖木兒 (Üs Temür, 1242-1295) 的建請外，<sup>93</sup> 可說主要是受到闊闊真的影響，而由賽典赤·伯顏與阿魯渾薩理兩位色目大臣居間扮演重要角色。<sup>94</sup> 以下有必要稍加介述賽典赤·伯顏與阿魯渾薩理二人。

賽典赤·瞻思丁 (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 1211-1279) 之孫伯顏 (Bayan, ?-1307)，本名阿不·別克兒 (Abū Bakr)。他出身回回世家，由於應對得體與財政實跡，頗受世祖寵信，成為至元末年繼桑哥之後的理財大臣。<sup>95</sup> 據《史集》載，就在忽必烈「賞賜了他很多東西，給他穿上了飾有寶石的衣服，並且把一切重要的事都托付給他辦」的同一天，闊闊真特地召見了他，請他去問世祖：「真金的寶座被封存九年了，你對此有何吩咐？」闊闊真雖未明言，但當時卻是鐵穆耳奉命撫軍漠北之際，用心不言可喻。據說世祖對於伯顏進奏十分高興，不僅再次予以獎賞，錫賜其祖父賽典赤之名，更授命他「現在就騎馬去把我那率軍向海都方面出征的孫子鐵穆耳叫回來吧，把他扶上他父親的寶座，舉行三天宴會，授予他帝位，然後讓他在三天之後出征，到軍隊裡去。」<sup>96</sup>《史集》記述不免有誤，畢竟鐵

<sup>91</sup> 同前引，頁 169。

<sup>92</sup> 宋濂等，《元史》，卷 18，〈成宗紀一〉，頁 382。

<sup>93</sup> 同前引，卷 119，〈玉昔帖木兒傳〉，頁 2948。

<sup>94</sup> 東宮舊臣王忱，據蘇天爵所撰行狀載，曾向世祖三度上章建言「早定大計」，世祖「是其言」，「未幾，成宗親承裕皇信寶，撫軍漠北，而大業遂定。」李朮魯獅所撰神道碑記述略同。將王忱建言與成宗得授皇太子寶聯繫，其說未盡真確。王忱進奏時間，行狀與神道碑都繫在至元二十四年改調河南道前，行狀存錄建言而有世祖「臨御多方，三十年矣」與真金「邇者鶴馭上賓」云云，可以為證。成宗撫軍北邊在進言五六年之後，恐不得謂為「未幾」。此事於《元史》本傳相應處改作：「裕宗薨於潛邸，忱建言：『陛下春秋高，當早建儲嗣。』」平章不忽木以聞，帝嘉納焉。」顯然對行狀與神道碑文字有所取捨。不過，所增「平章不忽木以聞」，即令別有所本，卻仍是一個明顯的錯誤。不忽木出任「平章」已在至元二十八年，與王忱進言時間有三四年之差。蘇天爵，《滋溪文稿》，卷 23，〈元故參知政事王憲穆公行狀〉，頁 379；李朮魯獅，《菊潭集》，卷 2，〈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頁 26a；宋濂等，《元史》，卷 151，〈王忱傳〉，頁 3568。

<sup>95</sup> 關於賽典赤·伯顏其人，詳見何高濟、陸峻嶺，《域外集——元史、中外關係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3），〈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賽典赤〉，頁 67-71；丁國範，〈至元大德年間的「賽梁秉政」〉，《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2/13（南京：1989-1990），頁 20-28；楊志玖，《元代回教史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頁 199-208。

<sup>96</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2 卷，頁 354-355。

穆耳當時莫說被授予帝位，即連坐上父親寶座（應指成為皇太子）亦未可得。這恐怕是對授皇太子寶傳聞的誤解。這段不盡正確的記載，在漢文文獻並無直接佐證。<sup>97</sup>有學者據伯顏在世祖與成宗二朝的貴顯政治地位，指出：「這應和他為成宗母闊闊真完成了向元世祖進言的使命並促成鐵穆耳的繼位有關。」<sup>98</sup>

阿魯渾薩理 (Aryun Sali, 1245-1307)，畏兀人，以父字為全氏。幼年受業八思巴，盡通其學，能解諸國語，後又淹通經史百家的中國之學，而有「全才」雅稱。他因八思巴向真金舉薦，而得召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sup>99</sup>深受器重。至元二十年，奉世祖命宿衛內朝，日侍左右，進諫有功。<sup>100</sup>據《元史》本傳載，他在真金死後，世祖詢問皇太子人選，即以成宗為對，「於是大計乃決」。事秘而未外傳，闊闊真母子「皆莫之知也」。他曾屢受鐵穆耳召見而不往，直至後者撫軍北邊，而他被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始至其邸。成宗即位，以「真得大臣體」為譽。<sup>101</sup>不過，《元史》本傳難免美化而多飾詞。屠寄已經明確指出：阿魯渾薩理本是「東宮舊僚」，闊闊真與鐵穆耳母子早已「引為立儲之援」，建請立儲與奉命授皇太子寶，都是「欲蓋彌彰之說」。<sup>102</sup>其說可從。可以略作補充的是，《元史》阿魯渾薩理本傳的虛飾，所欲突顯傳主的謹慎得體，實為避免時人之大忌：皇帝怯薛不得與東宮私相往來。<sup>103</sup>

此外，至元三十年十二月另有二事值得留意。一是在真金多年舊屬中，號稱最為「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的張九思，由於原為詹事同僚的丞相完澤薦舉，拜任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sup>104</sup>這是完澤援引東宮舊人的又一例證。王惲

<sup>97</sup> 賽典赤·伯顏權勢煊赫一時，《元史》卻未立傳，亦無時人所撰碑銘存世。史料闕佚的可能原因是：他在成宗死後的汗位之爭，選擇支持安西王阿難答與卜魯罕皇后，最後失敗受誅。

<sup>98</sup> 楊志玖，《元代回族史稿》，頁200。

<sup>99</sup> 趙孟頫，《趙孟頫集》，卷7，〈大元敕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全公神道碑銘〉，頁155。

<sup>100</sup> 宋濂等，《元史》，卷130，〈阿魯渾薩理傳〉，頁3174-3175；趙孟頫，《趙孟頫集》，卷7，〈大元敕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全公神道碑銘〉，頁155。

<sup>101</sup> 宋濂等，《元史》，卷130，〈阿魯渾薩理傳〉，頁3177。

<sup>102</sup>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118，〈阿魯渾薩理傳〉，頁4b-5a。

<sup>103</sup> 有個明顯的例證：英宗在東宮，聞拜住賢，遣使召之，希望與語。拜住不往，向來使說：「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宋濂等，《元史》，卷136，〈拜住傳〉，頁3300-3301。英宗為當朝皇太子，拜住猶須避嫌如此，可以想見時人的忌諱。

<sup>104</sup> 虞集，《虞集全集》下冊，〈〔徽政院使〕張忠獻公（九思）神道碑〔銘〕，應制〉，頁1053。

(1227-1304) 為張九思所寫壽詩，有句云：「青宮羽翼風雲舊，黃閣調和鼎鼐新」，<sup>105</sup> 形容九思以東宮舊臣出任中書新職的情形。闊闊真掌管的詹事院與元廷權力中樞的中書省，彼此聯結更形緊密。當時的中書省，包括係屬舊部的丞相完澤與左丞張九思，以及關係友善的首席平章賽典赤·伯顏和不忽木，幾乎可說已在闊闊真的掌握之下。

二是高麗忠烈王 (r. 1274-1308) 及公主請求如元親朝奏征日本事宜獲准，在當年十月出發，十二月二十日抵達大都，忽必烈已然「疾篤，不得見」。四天後，他們轉而晉謁闊闊真，獲贈金鍾諸物頗豐。隔年正月朔日，世祖因病免朝賀，他們改至闊闊真殿，獻上九匹白馬。<sup>106</sup> 這可說是前引姚燧〈普慶寺碑〉所謂闊闊真「外接宗親之會見」的具體例證，但在皇帝病篤的敏感時刻，連續謁見已故太子的元妃，忽略當朝皇后的南必，不免予人以聯想。高麗王一行如元，原欲奏陳征日不便，適值世祖晏駕，卻得轉白丞相完澤而寢東征。<sup>107</sup> 先前兩度進見闊闊真，對於完澤決議罷征，可能不無作用。<sup>108</sup>

## 五、至元三十一年：鐵穆耳即位的過程

成宗即位以後，史籍三見尊奉闊闊真為皇太后事。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鐵穆耳登上皇帝寶位，在上都（治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大安閣接受諸王宗親與文武百官朝賀，並即詔告天下。隨依故事，下詔追尊皇考真金為皇帝，尊太母元妃闊闊真為皇太后。五月九日，成宗遣官謹奉玉冊、玉寶，分別追上忽必烈尊諡與廟號，察必尊諡，真金尊諡與廟號，並再向闊闊真奉上皇太后尊號。十一月朔，成宗在隆福宮朝覲闊闊真，親奉玉冊、玉寶，又一次奉上皇太后尊稱。<sup>109</sup>

<sup>105</sup> 王惲，《王惲全集彙校》，卷 22，〈壽張左丞子友（甲午正月十六日）〉，頁 1058。

<sup>106</sup> 鄭麟趾等著，孫曉主編，《高麗史》（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卷 30，〈忠烈王世家三〉，頁 985；卷 31，〈忠烈王世家四〉，頁 987。

<sup>107</sup> 同前引。

<sup>108</sup> 同前引。

<sup>109</sup> 宋濂等，《元史》，卷 18，〈成宗紀一〉，頁 382-383。紀文失載上皇太后尊號玉冊文事。該冊文今存，係由王惲執筆。關於成宗尊奉闊闊真為皇太后，無論是徐毅「首請早正東朝尊號」，抑或是高麗王在成宗即位隔日「早定坤闈之懿號」的上表，可能都各有作用。黃潛著，王頌點校，《黃潛全集》下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徐公（毅）神道碑〔銘〕〉，頁 690；鄭麟趾等，《高麗史》，卷 31，〈忠烈王世家四〉，頁 988。

闊闊真作為蒙元首位正式受到尊奉的「皇太后」，當代既無成例可援，上尊號與進冊寶的諸般儀制都在此時初步奠立。<sup>110</sup> 成宗尊奉與所上尊號或尊稱都是皇太后，先是頒詔，其次遣官奉冊寶上尊號，最後親奉冊寶再上尊稱，頗為繁複，殊是慎重。前後三道文書——皇帝詔書與先後所上冊文，至今俱得存見。冊文的撰擬人與書寫者都仍可考知。<sup>111</sup> 冊文講究對仗，多用典故與套語，不免稍形溢美，卻仍能代表闊闊真在當時的評價。成宗親奉冊寶再上尊稱的冊文，出於陳儼（生卒年不詳）手筆，既得保存於有元一代文獻的詩文選集《國朝文類》，又被轉錄於明人修纂的《元史》闊闊真本傳，尤顯重要。該冊文有云：

助我前人，守卷耳憂勤之志；保予冲子，成思齊雍肅之風。肆神器之有歸，知孫謀之素定。畀付雖由於曆數，規摹一出於庭闈。<sup>112</sup>

先釋說其中用典與用語。〈卷耳〉為《詩·周南》篇名，〈詩序〉釋詩旨為后妃志在「輔佐君子」，進賢退不肖，「朝夕思念至於憂勤」。〈思齊〉為《詩·大雅》

<sup>110</sup> 《元史·禮樂志一》詳載太皇太后上尊號進冊寶儀制，排場十分盛大，禮節亦復繁複，其後皇太后上尊號進冊寶儀但云「同前儀」。宋濂等，《元史》，卷 67，頁 1680-1683。據所謂太皇太后及其「興聖宮」云云，應指尊奉答己之時所行儀禮，但仍可想見其概。另，「太后」應是時人習知的闊闊真尊稱，波斯史家拉施特不明就裡，甚而誤以為是世祖察必皇后，說詳前注 16。闊闊真甚至被稱為「大太后」、「也可太后」或「老太后」。同前引，卷 99，〈兵志二·宿衛·扈從軍〉，頁 2536；蔡巴·貢噶多吉，《紅史》，頁 27；許正弘，《元代原廟制度初探：以太禧宗禋院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00-101。「也可」即蒙語 *yeke*，亦即「大」之意。在 1338 年蒙漢文合璧的〈達魯花赤竹君之碑〉中，畏兀字蒙古文面可見 *yeke taiqiu*，意即也可（大）太后，對應的是漢文面的「裕聖太后」，亦即闊闊真。見渡部洋等，〈漢文·モンゴル文対訳「達魯花赤竹君之碑」（1338 年）訳註稿〉，《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29（京都：2010），頁 158，注 25。這個稱謂，在當時人，特別是在蒙古人的認知裡，想必等同於闊闊真的專稱。

<sup>111</sup> 成宗追尊真金與尊闊闊真的詔書，見不著撰人，洪金富校定，《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卷 1，〈詔令·成宗皇帝〉，頁 174。遣官奉冊寶上尊號之冊文，係王惲擬撰，見王惲，《王惲全集彙校》，卷 67，〈翰林遺稿·皇太后玉冊文〉，頁 2865-2866。成宗親奉冊寶上尊號之冊文，由陳儼起撰，見宋濂等，《元史》，卷 116，〈后妃傳二〉，頁 2898-2899；蘇天爵，《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正編》第 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元至正杭州路西湖書院刻本），卷 10，〈皇太后冊文〉，頁 105。二書所收略有數字異文。玉冊文為畏兀人唐仁祖奉敕所書。宋濂等，《元史》，卷 134，〈唐仁祖傳〉，頁 3254。此外，玉冊文應是蒙（八思巴字）漢文並書，而不只是今存文獻著錄的漢文。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立皇后玉冊〉、〈加上皇太后尊號玉冊〉，頁 271-274、275-278。

<sup>112</sup> 宋濂等，《元史》，卷 116，〈后妃傳二〉，頁 2899。

篇名，歌頌周文王所以為聖，全詩共二十四句，前六句分別讚美文王母親、祖母和妻子，亦即所謂「周室三母」。<sup>113</sup> 前人應指真金；冲子即冲人，意為年幼者，用作古代帝王自稱的謙辭，在此代指成宗。重新玩繹所引冊文：先是讚美闊闊真襄助真金，為國事憂慮勤勞，並以和睦莊重的母教育養成宗。接著提到的「神器」，現多用來代稱帝位或政權，原意卻是諸如玉璽等代表國家政權的實物。這不禁令人懸揣成宗繼位風波的傳國玉璽事件，而所謂孫謀素定，更清楚揭示早已籌謀有時。最後強調帝位相承雖與天象運行次序相應，出於天命，卻須歸功於闊闊真的擘畫。周良霄已經正確指出鐵穆耳得立，母妃闊闊真「始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sup>114</sup> 但有稍事補充的餘地。以下擬就闊闊真在成宗繼統期間扮演的角色，再作申說。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朔，世祖有疾，免朝賀。同月十九日，世祖病危，三天後駕崩。此後，直至新君鐵穆耳於四月十四日即位，歷經二月有餘。姚燧於仁宗朝奉敕撰寫〈普慶寺碑〉，碑後有辭，形容這段期間是「惟朝委裘，三月皇皇。」<sup>115</sup>「委裘」指稱帝位虛設，但置故君遺衣於座而受朝；「三月皇皇」則援引及改造「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舊典，巧妙傳達那段幾達三個月的惶恐情景。實際上，「三月無君」的情況在蒙元歷史屢見不鮮。大蒙古國新汗選立往往歷時年餘，忽必烈於憲宗死後即位亦且歷經八月，遑論與其弟長達數年的爭戰。準此以論，成宗三月繼統，究其歷時之短，加以史闕有間，反而引起後世學者諸般揣測。

鐵穆耳在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世祖死時，已經具備種種有利因素，尤其是與世祖顧命重臣伯顏、玉昔帖木兒交結較深，又能得到母妃支持，<sup>116</sup> 接班態勢趨向明朗。不過，世祖生前可能考量到鐵穆耳嗜酒問題，至死都未頒布成命，正式確定他的皇位繼承人身分，<sup>117</sup> 以至於死後依然「儲席虛正」。<sup>118</sup> 這使得新君嗣立，無法

<sup>113</sup>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1，頁36-41；卷16，頁1008-1016。朱熹以君王為主，將詩解作「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朱熹集註，《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1，頁3。援以解讀冊文，或可視為思念已逝的真金，可通，卻無參與政事之意，不免指涉稍狹。茲不取。

<sup>114</sup> 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頁42。

<sup>115</sup> 姚燧，《姚燧集》，卷11，頁160。

<sup>116</sup> 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訂本）》，〈元代晉王封藩問題探討〉，頁336-337。

<sup>117</sup> 蕭啟慶著，史衛民譯，〈元中期政治〉，收入傅海波（Herbert Frank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史衛民等中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568。有學者將世祖授皇太子寶予鐵穆耳，解讀為「第二次立儲」與「世祖選定的皇太孫」，恐與史實不符。辨見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下）〉，頁170。

訴諸漢地傳統的立儲制，勢須回歸蒙古舊俗的選君制，亦即必須經由宗親大會進行推舉。

成宗之前選汗大會的召集人，或以前大汗皇子之名，或以皇后之名，雖無具體規定可徵，但至少應是監國者或堪當稱制之任者。常例是以前大汗皇后中之一人的名義召開。<sup>119</sup> 選立鐵穆耳的大會是由闊闊真主持，可說是一變例，有其現實情勢發展的背景。

忽必烈死後臨時執政集團的主導權，概由三方勢力競逐：闊闊真妃、南必皇后，以及世祖顧命重臣的伯顏、玉昔帖木兒與不忽木。世祖病危前，驛召伯顏回朝，代表「決心循用中原王朝以顧命大臣宣布遺詔的故事，來實現自己的意志」。<sup>120</sup> 世祖彌留之際，伯顏與不忽木並受遺詔，侍疾禁中，以顧命大臣的身分控制朝廷。其間，完澤以中書右丞相之尊尚且不得參預，即連闊闊真欲加干涉，也被「非宮中所當預知」的理由回絕。<sup>121</sup> 但是，這種拒絕只能是暫時的。畢竟顧命大臣憑藉個人威望和背後強大軍事和官僚機器，固然可以宣揚遺命，然而召集選汗大會，明顯已經越權，窒礙難行。<sup>122</sup>

世祖死後五天，時任監察御史的徐毅 (1254-1314) 就上封事於南必與闊闊真，有云：「四海不可一日無君。……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啟姦覲，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協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sup>123</sup> 明諭宗親大臣，遣使迎奉新君，在在需要宮中皇帝與皇太子兩位遺孀的主持，至少必須假藉其名義。伯顏等人與闊闊真偏向的嗣君人選相同，為免南必皇后節外生

<sup>118</sup> 姚燧，《姚燧集》，卷 11，〈普慶寺碑〉，頁 160。

<sup>119</sup> 箭內互著，陳捷、陳清泉譯，《元朝制度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68。

<sup>120</sup> 陳得芝分冊主編，《中國通史·中古時代·元時期》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 446。

<sup>121</sup> 宋濂等，《元史》，卷 130，〈不忽木傳〉，頁 3171。傳文誤衍受遺詔者另有御史大夫月魯那顏，辨見修曉波，〈《元史》土土哈、不忽木列傳訂誤〉，《文獻》，4（北京：1997），頁 176-177。引文所謂「宮中」，或是完澤所進言的「太后」，似有指稱南必的可能。只是考慮到完澤與真金東宮的深厚關係，以及後人追述前事所用尊稱（南必應稱太皇太后，參見下注 123 與 128），應仍以代稱闊闊真較為合理。

<sup>122</sup> 可供參照的是，文宗朝權臣燕帖木兒功高震主，權傾朝野，元臣罕有其比。他在順帝即位前曾經提出強烈反對，卻仍無法阻止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的堅持。說詳許正弘，〈權守上位：卜答失里太后與晚元初期政治〉，《漢學研究》，38.2（臺北：2020），頁 178-187。

<sup>123</sup> 黃潛，《黃潛全集》下冊，〈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徐公（毅）神道碑〔銘〕〉，頁 690。標點略有更易。另，碑文原記上封事於「太皇太后」與「皇太后」，係出後人追記，揆諸當時情勢，應是各指南必與闊闊真。



枝，請奉故太子妃旨意部署人事，<sup>124</sup> 應在情理之中。

徐毅上書後三天，秦代傳國玉璽的再次出現，一方面可以強化鐵穆耳繼統的合法性，<sup>125</sup> 另一方面則能預防南必皇后稱制的可能性。<sup>126</sup> 這極有可能不是巧合。這個事件是由玉昔帖木兒轄下的御史臺官與闊闊真為主的詹事院臣發起，應為刻意安排，亦即上文所謂的「孫謀之素定」。《史集》提到闊闊真在忽必烈去世時，「在大異密們的贊同下」，派人告哀於鐵穆耳，準備「讓他登臨帝位」，並在他南返之前的一年中，「主持了一切重要國事」。<sup>127</sup> 這可能都是在闊闊真與世祖顧命重臣雙方合作之後的結果。至於南必皇后權勢原本有限，又無法利用召開選汗大會稱制行事，自難與聯合顧命大臣的闊闊真抗衡。大局已定之下，她選擇攜女出席忽里勒台，此後雖在史冊消失身影，卻仍得奉祀於神御殿，當時彼此的衝突或非十分激烈。<sup>128</sup>

<sup>124</sup> 宋濂等，《元史》，卷 169，〈劉哈刺八都魯傳〉，頁 3975。

<sup>125</sup> 傳國玉璽再現而形成的政治輿論明顯對於鐵穆耳有利，「內外稱慶」並非泛語，影響力不限於大都，就連當時「遠牧松江，久辭楓陛」的張之翰亦曾進表祝賀。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 26，〈傳國璽〉，頁 317-320；張之翰著，鄧瑞全、孟祥靜校點，《張之翰集》，《元代別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卷 13，〈傳國璽表〉，頁 157。劉浦江認為元初並不看重傳國璽，成宗即位時的再現只是應急之舉，明清時期更是不具任何政治號召力，足見傳國璽在中國政治文化的「淪落」。劉浦江，〈「五德終始」說之終結——兼論宋代以降傳統政治文化的嬗變〉，《中國社會科學》，2（北京：2006），頁 184-186。元廷不重傳國璽，劉氏所論極是，但他只引元初郝經之說為證，未能引據纂成於元文宗至順二年的《經世大典》，略有未足。事實上，《經世大典》作為元朝敕編的重要政書，可以提供更加權威的「官方」說法。全書雖早佚失，序錄猶幸存留，得以想見梗概。書有〈禮典〉，其上篇則有〈符寶〉一目，今存序錄，有云：「天命有德，何有於秦璽哉！我朝懲歷代之謬，雖得秦刻及前世之器，皆藏而弗用。」蘇天爵，《國朝文類》，卷 41，頁 425。

<sup>126</sup> 李則芬，《元史新講》第 3 冊，頁 251-253。

<sup>127</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2 卷，頁 375。該書提到闊闊真「派遣伯顏去追鐵穆耳合罕」，應該理解為下命伯顏遣使召回鐵穆耳。此即漢文文獻所謂闊闊真「召至成廟于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姚燧，《姚燧集》，卷 11，頁 159。此外，闊闊真又命阿魯渾薩理「為書趣成宗入正大位」，並遣重臣同張留孫郊迎鐵穆耳。宋濂等，《元史》，卷 130，〈阿魯渾薩理傳〉，頁 3177；陳垣編纂，陳智超、曾慶瑛校補，《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912。

<sup>128</sup> 陳得芝分冊主編，《中國通史·中古時代·元時期》上冊，頁 447。另，成宗即位後追尊其父，又尊其母，同時更尊世祖后妃為太皇太后。據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卷一收錄〈太皇太后詔〉，有云：「我祖母皇后徽柔懿恭，聖善明哲，助先皇帝成周南、召南之基；俾予冲人，紹大元至元之治。既嗣登于寶位，宜欽上於徽稱。謹依故事，尊曰太皇太后。其合行典禮，令有司討論以聞。」這位被尊為太皇太后的「祖母皇后」，已有學者指出應即南必。毛海明，〈《元史·成宗紀一》至元三十一年史事箋證〉，《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2（上海：2017），頁 9。若然，成宗尊奉南必，可能是對她願意出席忽里勒台的一種回報。只是後續「合行典禮」，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二日，鐵穆耳與玉昔帖木兒等人順利到達上都之後，「宗室諸王畢會」。<sup>129</sup> 波斯文文獻《史集》獨家存錄當時出席大會名單，雖是簡要列舉，卻已彌足珍貴。出席人員可依身分概分三類：一是南必皇后與闊闊真等后妃公主，二是忽必烈的皇子皇孫等宗王，三是以伯顏為首的重臣。<sup>130</sup> 這份名單代表大會定位與當時情勢，甚至可以解讀為純粹屬於忽必烈後人的家事。而這次大會仍然合乎蒙古忽里勒台的傳統程序：宗親合議，啟皇太后，左右部諸王畢集，定策，由宗盟之長首倡勸進，合辭推戴，等等。顯示忽里勒台制度在繼嗣問題的影響力猶在，尚未被世襲制度所取代。<sup>131</sup>

闊闊真與伯顏等重臣既已掌控大局，並都屬意於鐵穆耳繼位，於是在會上各盡所能地逼退另一可能競爭帝位的晉王甘麻剌——玉昔帖木兒以「儲闡符璽」已有所歸為詞，闊闊真提議兄弟誦讀祖宗寶訓，伯顏則握劍立於殿陛強勢宣命。<sup>132</sup> 大會召開期間，年已七旬的王慶端（1225-1304）「外總諸部，親翊禁鑾」，<sup>133</sup> 負責警備維安工作。他是真金重要宿衛將領，以侍衛軍都指揮使兼詹事院丞，在真金死後仍統東宮衛兵，護衛闊闊真，「獨以漢將膺宮朝心腹之寄」。<sup>134</sup> 甘麻剌等與會宗王即使對於帝位有所想望或異議，恐怕不能不心存忌憚，難以輕舉妄動。<sup>135</sup> 鐵穆耳確定繼任之後，由闊闊真親手授予新發現的傳國玉璽，而於四月十四日正式登基，

---

史無明文，付諸實行與否，恐有問題。畢竟尊立元朝第一位太皇太后，毫無其他文獻可徵，殊不合理。

<sup>129</sup> 閻復，《靜軒集》，卷 3，〈太師廣平貞憲王碑〉，頁 12a。成宗抵達上都的時間，係據宋濂等，《元史》，卷 18，〈成宗紀一〉，頁 381。

<sup>130</sup>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 2 卷，頁 375-376。據《元史》載，成宗即位兩月之後，定西平王奧魯赤等諸王「大會賞賜例」，所列諸王與《史集》相合。宋濂等，《元史》，卷 18，〈成宗紀一〉，頁 384。

<sup>131</sup> 蕭功秦，《蕭功秦集》，〈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頁 396。

<sup>132</sup> 陳得芝分冊主編，《中國通史·中古時代·元時期》上冊，頁 447。需要說明的是，《史集》將鐵穆耳「取得皇冠和寶座」的原因，完全歸諸於其精通並漂亮地講述成吉思汗的必里克（訓言）。這個說法或許過於簡化，甚至有點荒謬，但對北亞游牧民族政權而言，卻非毫無可能。其他游牧民族政權選立大汗的事例與討論，見丹尼斯·塞諾（Denis Sinor）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大汗的選立〉，頁 167-188。

<sup>133</sup> 閻復，《靜軒集》，卷 5，〈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王公神道碑銘〉，頁 47a。

<sup>134</sup> 程鉅夫，《程鉅夫集》，卷 17，〈冀國王忠穆公墓碑〉，頁 208。

<sup>135</sup> 李則芬推測「上都大會時，諸王因伯顏聲色俱厲而股栗，恐怕是王慶端〔按：應是「端」之誤〕的軍事部署使他們害怕的成分居多」，而王慶端後來也因功由正三品超晉正二品。李則芬，《元史新講》第 3 冊，頁 248。

是為成宗。<sup>136</sup> 而甘麻剌則被迫表明自己「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sup>137</sup> 甚至可能被要求留下「盟書」，宣示他和他的子孫只能守藩漠北，不得入繼大位。<sup>138</sup>

成宗即位後，闊闊真特命潔實彌爾 (Kashmir, 1253-1315) 陪侍甘麻剌返北就國。潔實彌爾是真金所遺近臣而留事闊闊真者之一。他在奉命侍送晉王歸藩途中，「具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遠範，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德可法、可鑒者」，得到肯定並獲賜衣。回朝還報，不僅闊闊真大為欣喜，成宗也以「善處吾兄弟之間」為譽。<sup>139</sup> 潔實彌爾陳說種種「善行美德」的真正用意，應是在於彌縫兄弟爭位的嫌隙，可能也是希望甘麻剌遵守「盟書」的委婉說法。

## 六、結語

元成宗鐵穆耳是國號改作大元後的首位繼立新君，而其得位所具的象徵意義，已有諸多學者加以論說，粲然可觀。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重新探究鐵穆耳的繼位歷程，特別聚焦於至元二十二年真金之死以降，直至忽必烈死後選立新君，幾個具有指標性的政治事件，析論其中各種政治力量的升降與重組，勾勒鐵穆耳逐漸脫穎而出的完整圖象。茲據研究所得稍可回應或補充前人重要成說者，概述如下，以為本文作結。

美國內亞史學者傅禮初 (Joseph F. Fletcher, 1934-1984) 將游牧民族藉助武力甚至戰爭以確定合法繼承人的模式，概括稱作「血腥的競爭推舉繼承制」(bloody tanistry)。他認為這樣的模式不僅普遍存在於中國的北族政權，更影響了傳承其政治遺產的漢人王朝，明朝在十五世紀中葉前仍未能建立穩固的嫡長子繼承制，即為一例。<sup>140</sup> 傅氏門生涂逸珊 (Isenbike Togan) 以前蒙古帝國時期的克烈汗國為中

<sup>136</sup> 宋濂等，《元史》，卷 18，〈成宗紀一〉，頁 381。

<sup>137</sup> 同前引，卷 115，〈顯宗傳〉，頁 2894。

<sup>138</sup> 張岱玉，《《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頁 32。

<sup>139</sup> 吳澄，《吳文正公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明成化二十年（1484）刊本），卷 32，〈大元榮祿大夫宣政使領延慶使贈推誠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文忠公神道碑〉，頁 15b-16a。

<sup>140</sup> Joseph F. Fletcher, "Bloody Tanistry: Authority and Succession in the Ottoman, Indian Muslim and Later Chinese Empi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3-8 September 1978, Bellagio, Italy). 關於傅氏此文與學界迴響的評介，詳見鍾烱，

心，深入論述十二至十三世紀的草原秩序及其政治思想，進而指出：至少在前帝國時期的部落秩序下，看重的是親人共存，隨意殺戮失敗者將會受到譴責。<sup>141</sup> 這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深化我們對於游牧民族政權選君原則的了解。本文討論鐵穆耳的繼位，同樣作為一個具體的實證案例，可以看到這齣兄弟鬩牆的戲碼，沒有上演兵戎相見的內戰套路，而是以長子甘麻刺被迫退讓作為收場。失敗的一方即便受到猜忌及削權，卻仍得退守藩國，積蓄實力。看似歸於平靜的落幕，實則預告另一場爭位大劇的開端。直到南坡之變發生，甘麻刺之子終於如願登上寶座，卻也埋下更多流血衝突及政治清算的伏筆。此其一。

元世祖以降的帝位繼承紛擾不休，但競爭者限於忽必烈後人，尤其是以真金後裔為主。這充分揭示元朝皇帝即便兼具蒙古帝國的宗主大汗和中國皇帝的雙重身分，但只是理想化的期待，「大元帝國的地域性終究強過她的世界性。」<sup>142</sup> 真金曾經被立為儲君，固然使得他的「後人最有帝位繼承資格」，<sup>143</sup> 卻非絕對保證，仍然充滿變數。身為嫡幼子的那木罕與繼守正宮的南必皇后，無疑是兩大有力的皇位挑戰者，從而引起後世學者種種揣測。本文明確指出：那木罕死於至元二十八年七月，而其勢力在生前受到世祖權臣的削弱，身後更無子嗣可以角逐大位。而南必即便生有一子，但可能早夭，同樣失去了施展拳腳的政治舞臺。質言之，真金後人取得元朝皇位有其偶然性，卻已形成一項政治傳統，<sup>144</sup> 日後忙哥刺之子希望入繼大統，就遭到「支子不嗣」的強烈質疑。此其二。

游牧民族君主入主中國後，為求擴大政治權威與穩定繼承機制，往往逐漸捨棄原有部族推選習俗，轉而採行漢式的嫡長世襲制度。唯制度的改造並非一蹴可幾，有時曲折迂迴，不進反退，充滿諸多變因，無法一概而論。成宗得以繼位，有學者認為是從至元早期漢制的嫡長世襲制，再次倒退至蒙古幼子承繼的傳統。<sup>145</sup> 這個

---

《重釋內亞史：以研究方法論的檢視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傳禮初在西方內亞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響〉，頁 200-243。

<sup>141</sup> Isenbike Togan, *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Steppe Formations: The Kerait Khanate and Chinggis Khan* (Leiden: Brill, 1998).

<sup>142</sup> 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頁 32。

<sup>143</sup> 蕭啟慶，〈元中期政治〉，頁 567。

<sup>144</sup> 如同北魏子貴母死的發生，原本是當時政治利益衝突的結果，可說是一個政治選擇，其後竟而形成「類似風俗的拓跋傳統」，被視為一種制度。羅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頁 88。

<sup>145</sup> 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 11 章，頁 571。此外，有些學者也同樣強調成宗獲得闊闊真的偏愛，原因「可能是蒙古人濃重的幼子守產的觀念所致」。張岱玉，〈《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頁 32。

說法有其道理，但重新審視至元三十年鐵穆耳繼任優勢的形成及隔年即位的過程，不免令人對其說有所保留。無論是闊闊真，又或其他重臣，為求加強鐵穆耳繼位的合法性與正統性，援引的是漢人的皇太子寶與傳國玉璽，加上蒙古的忽里勒台舊俗，至少未見任何強調幼子守產傳統的痕跡。事實上，在日後屢見不鮮的皇位爭奪戰中，幼子身分始終不是一種可供運用的政治資本。此其三。

以伯顏為首的顧命大臣，憑藉個人威望及其背後強大的軍事和官僚組織，在選汗大會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創下先例，同時開啟未來權臣推動新君即位的風氣。<sup>146</sup>這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選汗大會往往是以前大汗皇后中之一人的名義召開，闊闊真作為召集人，排除南必皇后的勢力，屬於變例，顯然需要爭取伯顏等大臣的支持。於是一個變例賦予另一個先例形成的空間，從而可知政治原本就是各取所需的權力遊戲，沒有永遠不變的遊戲規則。此其四。

遺憾的是，由於資料的限制，爭權失敗的南必皇后，抑或屈居下風的甘麻剌，他們在文獻上的身影顯得模糊，即便竭力追索，仍然留下許多無解的謎團。根據勝利者留下的紀錄，成功似乎一切順理成章，卻也不免對其中闕白有所難安。我們知道的和能知道的實在有限！然而，無米之炊畢竟是學術研究的大忌，唯有盡力了解與運用現有的材料，避免過度或沒有任何佐證的懸揣。

（責任校對：廖安婷）

---

<sup>146</sup> 蕭啟慶，〈元中期政治〉，頁 570。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不著撰人 Anonymous Author，洪金富 Hung Chin-fu 校定，《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  
*Hong Jinfu jiaodingben Yuan dianzhang*，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2016。
- 毛 亨 Mao Heng 傳，鄭玄 Zheng Xuan 箋，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毛詩正義》  
*Maoshi zhengyi*，收入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十三經注疏》*Shisanjing zhushu*  
第 4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9。
- 王 政 Wang Zheng 修，王庸立 Wang Yongli、黃來麟 Huang Lailin 纂，《道光滕縣志》  
*Daoguang Tengxian zhi*，《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Zhongguo difangzhi jicheng, Shandong fuxianzhi ji* 第 75 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4，清道光二十六年 (1846) 刻本 Qing Daoguang ershiliu nian (1846) keben。
- 王 惲 Wang Yun 著，楊亮 Yang Liang、鍾彥飛 Zhong Yanfei 點校，《王惲全集彙校》  
*Wang Yun quanji huij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 朱 熹 Zhu Xi 集註，《詩集傳》*Shi jiz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8。
- 吳 澄 Wu Cheng，《吳文正公集》*Wu Wenzhenggong ji*，《元人文集珍本叢刊》  
*Yuanren wenji zhenben congtan* 第 3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85，明成化二十年 (1484) 刊本 Ming Chenghua ershi nian (1484) kanben。
- 李昉魯翀 Bozhulu Chong，《菊潭集》*Jutan ji*，《元人文集珍本叢刊》*Yuanren wenji zhenben congtan* 第 6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85，  
《藕香零拾》本 *Ouxiang lingshi ben*。
- 宋 濂 Song Lian 等，《元史》*Yuan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6。
- 拉施特 Rashid al-Din Tabib 主編，余大鈞 Yu Dajun 譯，《史集》*Shiji* 第 3 卷，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86。
- 拉施特 Rashid al-Din Tabib 主編，余大鈞 Yu Dajun、周建奇 Zhou Jianqi 譯，《史集》  
*Shiji* 第 1 卷第 1 分冊，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83。

- \_\_\_\_\_, 《史集》*Shiji* 第 2 卷,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85。
- 刺失德丁特 Rashid al-Din Tabib 原著, 波義耳 J. A. Boyle 英譯, 周良霄 Zhou Liangxiao 譯注, 《成吉思汗的繼承者: 《史集》第二卷》*Chengjisihan de jichengzhe: Shiji di er juan*, 天津 Tianjin: 天津古籍出版社 Tianjin guji chubanshe, 1992。
- 姚燧 Yao Sui 著, 查洪德 Zha Hongde 編校, 《姚燧集》*Yao Sui ji*,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2011。
- 袁桷 Yuan Jue 著, 李軍 Li Jun、施賢明 Shi Xianming、張欣 Zhang Xin 校點, 《袁桷集》*Yuan Jue ji*, 《元代別集叢刊》*Yuandai bieji congkan*, 長春 Changchun: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2010。
-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著, 沙海昂 A. J. H. Charignon 注, 馮承鈞 Feng Chengjun 譯, 党寶海 Dang Baohai 新注, 《馬可波羅行紀》*Make Boluo xingji*,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 1999。
- 屠寄 Tu Ji, 《蒙兀兒史記》*Mengwu'er shiji*, 臺北 Taipei: 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 1994。
- 陳垣 Chen Yuan 編纂, 陳智超 Chen Zhichao、曾慶瑛 Zeng Qingying 校補, 《道家金石略》*Daojia jinshi lue*, 北京 Beijing: 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 1988。
- 張之翰 Zhang Zhihan 著, 鄧瑞全 Deng Ruiquan、孟祥靜 Meng Xiangjing 校點, 《張之翰集》*Zhang Zhihan ji*, 《元代別集叢刊》*Yuandai bieji congkan*, 長春 Changchun: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2009。
- 陶宗儀 Tao Zongyi, 《南村輟耕錄》*Nancun chuogeng lu*,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Yuan Ming shiliao biji congk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59。
- 程鉅夫 Cheng Jufu 著, 張文澍 Zhang Wenshu 校點, 《程鉅夫集》*Cheng Jufu ji*, 《元代別集叢刊》*Yuandai bieji congkan*, 長春 Changchun: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wenshi chubanshe, 2009。
- 黃潛 Huang Jin 著, 王頌 Wang Ting 點校, 《黃潛全集》*Huang Jin quanji* 下冊, 天津 Tianjin: 天津古籍出版社 Tianjin guji chubanshe, 2008。
- 楊承父 Yang Chengfu 修, 王元賓 Wang Yuanbin 纂, (萬曆)《滕縣志》(Wanli) *Tengxian zhi*,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Riben cang Zhongguo hanjian difangzhi congkan* 第 29 冊, 北京 Beijing: 書目文獻出版社 Shumu wenxian chubanshe, 1992,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十三年 (1585) 刊本 Riben Zunjingge wenku cang Ming Wanli shisan nian (1585) kanben。

- 虞 集 Yu Ji 著，王頌 Wang Ting 點校，《虞集全集》*Yu Ji quanji* 下冊，天津 Tianjin：天津古籍出版社 Tianjin guji chubanshe，2007。
- 趙孟頫 Zhao Mengfu 著，任道斌 Ren Daobin 校點，《趙孟頫集》*Zhao Mengfu ji*，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1986。
- 劉 因 Liu Yin，《劉文靖公文集》*Liu Wenjing gong wenji*，《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Beijing tushuguan guji zhenben congkan* 集部第 93 冊，北京 Beijing：書目文獻出版社 Shumu wenxian chubanshe，1988，明成化十五年 (1479) 蜀藩刊本 Ming Chenghua shiwo nian (1479) Shufan kanben。
- 蔡 巴·貢噶多吉 Tshal-pa Kun-dga'r do-rje 著，東嘎·洛桑赤列 Dung-dkar-blo-bzang-vphren-leg 校注，陳慶英 Chen Qingying、周潤年 Zhou Runnian 譯，《紅史》*Hongshi*，拉薩 Lhasa：西藏人民出版社 Xizang renmin chubanshe，1988。
- 鄭思肖 Zheng Sixiao 著，陳福康 Chen Fukang 校點，《鄭思肖集》*Zheng Sixiao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1。
- 鄭麟趾 Zheng Linzhi 等著，孫曉 Sun Xiao 主編，《高麗史》*Gaoli shi*，重慶 Chongqing：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13。
- 閻 復 Yan Fu，《靜軒集》*Jingxuan ji*，《元人文集珍本叢刊》*Yuanren wenji zhenben congkan* 第 2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85，《藕香零拾》本 *Ouxiang lingshi ben*。
- 蘇天爵 Su Tianjue，《國朝文類》*Guochao wenlei*，《四部叢刊·正編》*Sibu congkan, zhengbian* 第 9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9，元至正杭州路西湖書院刻本 Yuan Zhizheng Hangzhoulu Xihu shuyuan keben。
- 蘇天爵 Su Tianjue 著，陳高華 Chen Gaohua、孟繁清 Meng Fanqing 點校，《滋溪文稿》*Zixi weng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 蘇天爵 Su Tianjue 輯撰，姚景安 Yao Jing'an 點校，《元朝名臣事略》*Yuanchao mingchen shilu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6。

## 二、近人論著

- 丁國範 Ding Guofan，〈真金與權臣的鬥爭〉“Zhenjin yu quanchen de douzheng”，《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Yuanshi ji beifang minzu shi yanjiu jikan*，8，南京 Nanjing：1984，頁 21-27。
- ，〈至元大德年間的「賽梁秉政」〉“Zhiyuan Dade nianjian de ‘Sai Liang bingzheng’”，《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Yuanshi ji beifang minzu shi yanjiu jikan*，12/13，南京 Nanjing：1989-1990，頁 20-28。



- 丹尼斯·塞諾 Denis Sinor 著，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 Beijing daxue lishixi minzu shi jiaoyanshi 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Dannisi Sainuo Neiya yanjiu wenx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 毛海明 Mao Haiming，〈《元史·成宗紀一》至元三十一年史事箋證〉“*Yuanshi, Chengzong ji yi Zhiyuan sanshiyi nian shishi jianzheng*”，《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Yuanshi ji minzu yu bianjiang yanjiu jikan*，32，上海 Shanghai：2017，頁 1-30。
- 王 頤 Wang Ting，《龍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Longting chonghan: Yuandai zhengzhishi yanjiu*，海口 Haikou：南方出版社 Nanfang chubanshe，2002。
- 王宗維 Wang Zongwei，《元代安西王及其與伊斯蘭教的關係》*Yuandai Anxiwang ji qi yu Yisilanjiao de guanxi*，蘭州 Lanzhou：蘭州大學出版社 Lanzhou daxue chubanshe，1993。
- 王啟龍 Wang Qilong，《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Basiba shengping yu Zhang suozhi lun duikan yanji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99。
- 王靖華 Wang Jing-hua，《元代興亡原因的探討》*Yuandai xingwang yuanyin de tantao*，臺北 Taipei：名山出版社 Mingshan chubanshe，1985。
- 石 晶 Shi Jing、呂文 Lü Wen，〈李元墓志及其史料價值〉“*Li Yuan muzhi ji qi shiliao jiazhi*”，《棗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Zaozhuang shifan zhuanke xuexiao xuebao*，21.6，棗莊 Zaozhuang：2004，頁 38-39。
- 史衛民 Shi Weimin，《元代軍事史》*Yuandai junshishi*，《中國軍事通史》*Zhongguo junshi tongshi* 第 14 卷，北京 Beijing：軍事科學出版社 Junshi kexue chubanshe，1998。
- 多 桑 Constantin d’Ohsson 著，馮承鈞 Feng Chengjun 譯，《多桑蒙古史》*Duosang Menggu shi*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2003。
- 何高濟 He Gaoji、陸峻嶺 Lu Junling，《域外集——元史、中外關係史論叢》*Yuwai ji: Yuanshi, Zhong wai guanxi shi lunco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 李明仁 Li Ming-jen，《中國古代君主繼承制之研究》*Zhongguo gudai junzhu jichengzhi zhi yanjiu*，新北 New Taipei：稻鄉出版社 Daoxiang chubanshe，2012。
- 李治安 Li Zhi’an，《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訂本）》*Yuandai fenfeng zhidu yanjiu (zeng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 李則芬 Li Zefen, 《元史新講》*Yuanshi xinjiang* 第 3 冊, 臺北 Taipei: 黎明文化 Liming wenhua, 1989。
- 沈衛榮 Shen Weirong, 《西藏歷史和佛教的語文學研究》*Xizang lishi han Fojiao de yuwenxue yanji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0。
- 杉山正明 Sugiyama Masaaki 著, 孫越 Sun Yue 譯, 邵建國 Shao Jianguo 校, 《蒙古帝國的興亡》*Menggu diguo de xingwang* 下冊,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5。
- 周良霄 Zhou Liangxiao, 〈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Menggu xuanhan yizhi yu Yuanchao huangwei jicheng wenti”, 收入中國元史研究會 Zhongguo Yuanshi yanjiuhui 編, 《元史論叢》*Yuanshi luncong* 第 3 輯,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6, 頁 31-46。
- 周良霄 Zhou Liangxiao、顧菊英 Gu Juying, 《元史》*Yuan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3。
- 邵循正 Shao Xunzheng, 《邵循正歷史論文集》*Shao Xunzheng lishi lunwenji*,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85。
- 洪金富 Hung Chin-fu,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Yuan Xijin zhi, Yuanmiao, Xingxiang pian shuzheng”,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79.1, 臺北 Taipei: 2008, 頁 1-40。doi: 10.6355/BIHPAS.200803.0001
- 馬曉林 Ma Xiaolin, 〈元代岳鎮海瀆祭祀考述〉“Yuandai Yuezhen haidu jisi kaoshu”, 《中國史研究》*Zhongguoshi yanjiu*, 4, 北京 Beijing: 2011, 頁 131-144。
- , 《元代國家祭祀研究》*Yuandai guojia jisi yanjiu*, 天津 Tianjin: 南開大學博士論文 Nankai daxue boshi lunwen, 2012。
- 修曉波 Xiu Xiaobo, 〈《元史》土土哈、不忽木列傳訂誤〉“Yuanshi Tutuha, Buhumu liezhuan dingwu”, 《文獻》*Wenxian*, 4, 北京 Beijing: 1997, 頁 170-177。
- 島田正郎 Shimada Masao, 《北亞洲法制史》*Beiyazhou fazhi shi*, 臺北 Taipei: 中國文化學院 Zhongguo wenhua xueyuan, 1964。
- 張 帆 Zhang Fan,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Yuandai zaixiang zhidu yanjiu*,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7。
- 張岱玉 Zhang Daiyu, 《《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Yuanshi, Zhuwang biao buzheng ji bufen zhuwang yanjiu*, 呼和浩特 Hohhot: 內蒙古大學博士論文 Neimenggu daxue boshi lunwen, 2008。

- 張瑞成 Chang Shui-cheng, 《元朝衰亡文化因素之研究》*Yuanchao shuaiwang wenhua yinsu zhi yanjiu*, 新北 New Taipei: 花木蘭文化 Huamulan wenhua, 2012。
- 許正弘 Hsu Cheng-hung, 《元代原廟制度初探：以太禧宗禋院為中心》*Yuandai Yuanmiao zhidu chutan: yi Taixi zongyin yuan wei zhongxin*, 新竹 Hsinchu: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qinghua daxue lishi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2009。doi: 10.6843/NTHU.2009.00073
- \_\_\_\_\_, 〈杭州飛來峰元至元二十九年造像題記疏證〉“Hangzhou Feilaifeng Yuan Zhiyuan ershijiu nian zaoxiang tiji shuzheng”, 《中華佛學研究》*Zhonghua Foxue yanjiu*, 17, 新北 New Taipei: 2016, 頁 61-87。
- \_\_\_\_\_, 〈權守上位：卜答失里太后與晚元初期政治〉“Quanshou shangwei: Budashili taihou yu Wanyuan chuqi zhengzhi”, 《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38.2, 臺北 Taipei: 2020, 頁 171-214。
- 陳得芝 Chen Dezhi, 《蒙元史研究叢稿》*Mengyuanshi yanjiu congkao*,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2005。
- 陳得芝 Chen Dezhi 分冊主編, 《中國通史·中古時代·元時期》*Zhongguo tongshi, Zhonggu shidai, Yuan shiqi* 上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7。
- 陳廣恩 Chen Guang'en, 〈元安西王忙哥刺死因之謎〉“Yuan Anxiwang Manggela siyin zhi mi”, 《民族研究》*Minzu yanjiu*, 3, 北京 Beijing: 2008, 頁 96-104。
- 黃時鑒 Huang Shijian, 《大漠孤煙·蒙古史 元史》*Damo guyan, Menggu shi Yuanshi*, 《黃時鑒文集》*Huang Shijian wenji* 第 1 冊,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1。
- 楊志玖 Yang Zhijiu, 《元代回族史稿》*Yuandai Huizu shigao*, 天津 Tianjin: 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daxue chubanshe, 2003。
- 劉 曉 Liu Xiao, 《元史研究》*Yuanshi yanjiu*, 福州 Fuzhou: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2006。
- 劉迎勝 Liu Yingsheng, 《蒙元史考論》*Mengyuanshi kaolun*, 蘭州 Lanzhou: 蘭州大學出版社 Lanzhou daxue chubanshe, 2014。
- 劉浦江 Liu Pujiang, 〈「五德終始」說之終結——兼論宋代以降傳統政治文化的嬗變〉“Wude zhongshi' shuo zhi zhongjie: jianlun Songdai yijiang chuantong zhengzhi wenhua de shanbian”, 《中國社會科學》*Zhongguo shehui kexue*, 2, 北京 Beijing: 2006, 頁 177-190。
- 箭內互 Yanai Watari 著, 陳捷 Chen Jie、陳清泉 Chen Qingquan 譯, 《元朝制度考》*Yuanchao zhidu kao*, 上海 Shanghai: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1934。

- 蔡美彪 Cai Meibiao,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Basibazi beike wenwu jishi*,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1。
- 蕭功秦 Xiao Gongqin, 《蕭功秦集》*Xiao Gongqin ji*, 哈爾濱 Harbin: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1995。
- 蕭啟慶 Hsiao Ch'i-ch'ing, 《西域人與元初政治》*Xiyuren yu Yuanchu zhengzhi*,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Guoli Taiwan daxue wenxueyuan, 1966。doi: 10.6327/NTUPRS-EBK1020000176
- , 《元朝史新論》*Yuanchaoshi xinlun*, 臺北 Taipei: 允晨文化 Yunchen wenhua, 1999。
- 蕭啟慶 Hsiao Ch'i-ch'ing 著, 史衛民 Shi Weimin 譯, 〈元中期政治〉“Yuan zhongqi zhengzhi”, 收入傅海波 Herbert Franke、崔瑞德 Denis Twitchett 編, 史衛民 Shi Weimin 等中譯,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907-1368 年》*Jianqiao Zhongguo Liao Xixia Jin Yuan shi: 907-1368 nian*,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98, 頁 563-641。
- 鍾 烱 Zhong Han, 〈《心史·大義略敘》成書時代新考〉“*Xin shi, Dayi luexu chengshu shidai xinkao*”, 《中國史研究》*Zhongguoshi yanjiu*, 1, 北京 Beijing: 2007, 頁 133-149。
- , 《重釋內亞史: 以研究方法論的檢視為中心》*Chongshi Neiya shi: yi yanjiu fangfalun de jianshi wei zhongxin*,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7。
- 韓百詩 Louis Hambis 著, 張國驥 Zhang Guoji 譯, 《元史·諸王表箋證》*Yuanshi, Zhuwang biao jianzheng*, 長沙 Changsha: 湖南大學出版社 Hunan daxue chubanshe, 2005。
- 魏復古 Karl A. Wittfogel 等著, 鄭欽仁 Cheng Chin-jen、李明仁 Li Ming-jen 編譯, 《征服王朝論文集》*Zhengfu wangchao lunwenji*, 新北 New Taipei: 稻鄉出版社 Daoxiang chubanshe, 1999。
- 羅 新 Luo Xin,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Heizhan shang de Beiwei huangdi*, 北京 Beijing: 海豚出版社 Haitun chubanshe, 2014。
- 後藤富男 Goto Tomio, 《內陸アジア遊牧民社会の研究》*Nairiku aji'a yūbokumin shakai no kenkyū*, 東京 Tokyo: 吉川弘文館 Yoshikawa kobunkan, 1968。
- 渡部洋 Watanabe Hiroshi 等, 〈漢文・モンゴル文対訳「達魯花赤竹君之碑」(1338 年) 訳註稿〉“Kanbun Mongorubun taiyaku ‘darugachi Takekun no isibumi’ (1338 nen) yakuchūkō”, 《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Shinshu sogo kenkyusho kenkyū kiyō*, 29, 京都 Kyoto: 2010, 頁 107-238。

- Eberhard, Wolfram.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65.
- Fletcher, Joseph F. "Bloody Tanistry: Authority and Succession in the Ottoman, Indian Muslim and Later Chinese Empi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3-8 September 1978, Bellagio, Italy.
- Mote, F.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doi: 10.2307/j.ctv1cbn3m5
- Pelliot, Paul.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
- Rossabi, Morris.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Togan, Isenbike. *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Steppe Formations: The Kerait Khanate and Chinggis Khan*. Leiden: Brill, 1998.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ccession of Emperor Chengzong in the Yuan Dynasty**

**Hsu Cheng-hu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s9843805@m98.nthu.edu.tw

### **ABSTRACT**

The disputes over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he Yuan dynasty wer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its decline and fall. Among these disputes, the succession of Yuan Chengzong 元成宗 (r. 1294-1307)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Chengzong was the first emperor to succeed after Shizu 世祖 (r. 1260-1294) declared the dynastic name Da Yuan 大元 (Great Yuan), and he was also the first descendant of Jingim 真金 to take control of the throne. This paper re-examines several indicative political events before the succession of Chengzong,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storm caused by the death of Jingim, the tendency of Jingim's sons to become designated as heirs, the formation of Chengzong's ascendancy and the process of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It also discusses the rise, fall and re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forces during Shizu's reign as seen in the above events, especially the political role played by Jingim's widow, Kökejin 闊闊真.

**Key words:** Yuan dynasty,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Yuan Chengzong 元成宗, Temür 鐵穆耳, Kökejin 闊闊真, Kammala 甘麻剌

## Interprétation de la succession de l'Empereur Chengzong des Yuan

Les disputes interminables pour la succession au trône des empereurs Yuan peuvent être considérées comme un facteur important ayant entraîné le déclin, et même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Le présent article considère la question de la succession de l'Empereur Chengzong 成宗 (r. 1294-1307), et apporte une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d'événements politiques antérieurs à son avènement, tels que des désordres politiques dus au décès de Jingim 真金, le choix de son héritier, et la situation avantageuse du futur Empereur. L'article souligne l'ascension et la chute des diverses forces politiques ainsi que leurs réorganisations sous le règne de Shizu 世祖 (r. 1260-1294), spécialement le rôle joué par la veuve de Jingim, Kökejin 闊闊真.

**Mots clés :** Dynastie Yuan, succession au trône impérial, l'Empereur Chengzong des Yuan 元成宗, Temür 鐵穆耳, Kökejin 闊闊真, Kammala 甘麻剌

## 元成宗の継承問題における考察

元王朝の継承問題は、その衰亡における重要な一因と言える。本論は元成宗テムル (r. 1294-1307) の継承問題を検討し、その即位前に起きた指標的な政治問題、例えばチンキム (1243-1286) の世継ぎ問題、チンキムの子息が継承者として確立する過程、成宗即位の有利形成及びその過程などを改めて分析する。本論では、これらの事件には世祖クビライ (r. 1260-1294) の時代の各政治勢力が組む直されたことを指摘、特にチンキムの妃ココジン (?-1300) の担った政治的役目と作用に注目した。また従来の研究の疑問に対する応答及び補足も行う。

**キーワード :** 元朝、皇位継承、元成宗、テムル、ココジン、カマラ

## Eine Analyse der Thronnachfolge von Kaiser Chengzong in der Yuan Dynastie

Der dauernde Kampf in der Yuan-Dynasty um die Thronnachfolge war sicherlich die wichtigste Ursache ihres Untergangs. Der folgende Artikel diskutiert die Nachfolgefrage von Kaiser Chengzong 成宗 (r. 1294-1307) und untersucht und analysiert insbesondere mögliche der Thronnachfolge vorausgehende Hinweise auf die politischen Umstände. Diese schließen ein: der Aufruhr nach dem Tod von Jingim 真金, die Etablierung von Kandidaten als Nachfolger von Jingim, der Prozess der zu Chengzongs überlegener Position als Thronnachfolger führte, etc. Der folgende Artikel zeigt Aufstieg und Fall und Rekonstituierung der Machtverhältnisse am Hofe von Shizu 世祖 (r. 1260-1294) auf mit besonderem Augenmerk auf den politischen Einfluss von Jingims Witwe Kökejin 闊闊真; demgemäß leistet er einen wertvollen Beitrag zu der bestehenden Forschung in diesem Bereich.

**Key Wörter:** Yuan Dynastie, Thronnachfolge, Kaiser Chengzong der Yuan Dynastie  
元成宗, Temür 鐵穆耳, Kökejin 闊闊真, Kammala 甘麻剌

(收稿日期：2020. 2. 14；修正稿日期：2020. 8. 11；通過刊登日期：2020. 9. 29)